

太原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研究之北境教区

姓名：马骥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建筑技术科学

指导教师：王瑛

20080501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研究之北境教区^①

摘 要

天主教堂是山西近代较早出现的西方建筑类型。对山西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晋北地区的传播过程，为我们研究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对研究晋北地区近代建筑的本土化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北境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社会历史背景、地域分布、发展状况、基本特点、建筑风格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由此展示出北境教区天主教堂作为西方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出程度各不相同的本土化形态，成为晋北教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中相当有价值的组成部分。笔者实地调查了北境教区现存的大部分天主教堂，收集第一手资料，并从建筑角度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天主教堂作为山西较早出现的欧洲建筑类型，受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方传统，尤其是曲折的历史背景的影响，其形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庙宇式教堂”，反映了天主教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对当地传统建筑形式的被迫接受。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50578100)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20041062)

二，“仿欧式教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对西式教堂形式的强行推广。

三，“中西合璧式教堂”，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的主动适应，但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本土化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

四，“本土式教堂”，反映了建国后教堂的本土化进程的发展与成熟。

成熟的教堂建筑以大厅、祭坛以及起图腾崇拜作用的主立面为其“三要素”。其平面形式不再固守传统的规整的对称格局，而变得相对灵活和实用，常以拉丁十字的基本形式来表达基督受难的含义。教堂的朝向也基本稳定，或者朝南以满足传统观念，或者面向主要居民区、交通要道，使教堂建筑显得格外突出，同时也方便教民朝拜。

北境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的建筑历史和文化，而且丰富了我国城市乃至乡村的景观。另外，通过调查与分析现状，做基础性的工作汇总，为今后如何保护、改造和利用山西近代建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山西建筑 近代天主教堂 北境教区 中西融合 本土化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NORTH SHANXI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came into Shanxi, it had brought a new spiritual architecture, church. As the earliest European architecture,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area built from mid-19th century on, inevitably would have influenced by society, culture, region and folklore in location, came into being different changes in style, resulted in a vernacular church type, which combined the western spiritu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easter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 Shanxi's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which are very valuable historical culture, are real demonstra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contacting to merging.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xi north parish. It star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ackground materials about the progress of catholic church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 Church in Shanxi and location of churches in Shanxi north parish. Following, as time to a clue, it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curr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Shanxi church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mid-19th century.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churches' forms in Shanxi north parish,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vernacular features of Shanxi churches by contrasting the western and Shanxi's catholic churches. Finally, this paper sums up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xi. Further more, it makes clear the value of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It has especial value to study th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that can help us to find out the west culture spread and commun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in Shanxi. In addition, it can be a reference in some ways to protect and reconstruct modern buildings by means of this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KEY WORDS: Shanxi architectur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Shanxi north parish, combin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building styles, localization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马骥 日期： 2008. 6. 10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太原理工大学有关保管、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其中包括：①学校有权保管、并向有关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原件与复印件；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复制并保存学位论文；③学校可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或借阅；④学校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复制赠送和交换学位论文；⑤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签 名： 马骥 日期： 2008. 6. 10

导师签名： 王璞 日期： 2008. 6. 10

第一章 绪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展开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其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发展与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同时进行,这两种建筑活动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使中国近代建筑具有独特的特征,呈现出以中西交融为主色调的建筑文化景观。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建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建筑史中,近代建筑处于承上启下、新老并存的过渡阶段,它既是传统建筑的延续,又是当代建筑的开端;既有传统的表现,又有外来形式的殖入,还有对新形式的探索。因此,对近代建筑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角度

1.1.1 研究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山西近代北境天主教堂建筑,以及这些建筑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其本土化的基本特点。作为一种典型的近代建筑类型,在晋北地区陆续建成的教堂,如实地记录了近代外来建筑文化在晋逐步本土化的特点和过程。

所谓山西北境教区严格意义上是指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划分为南北境两大教区中的北境教区。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北境教区又多次划分更迭,从1922~1932年间陆续细划为五大教区:大同教区,朔县教区,汾阳教区、榆次教区、太原教区。本论文所研究的北境教区及其时间界限是指:地域上,以1890年划分的北境教区为界,与1922~1932年划分的五大教区范围基本吻合;时间上,以1620年天主教第三次传入山西^①为起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1.1.2 研究的角度

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建筑文化的本土化。1620~1949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

^①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7页。

特殊时段，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本文对这一时期不同形式的天主教堂进行分析归纳，并从其宗教文化背景和建筑形制特色，以及与晋北乡土建筑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晋北地区天主教堂所体现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由此说明，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内陆地区，欧洲传统建筑受制于地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在各个阶段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形象。同时，通过对这一时期不同阶段天主教堂特点的纵向比较，揭示西方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从碰撞到交融并最终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的外来建筑形式中，最早出现的形式之一就是教堂。教堂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殖入形式的建筑，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早期形式，教堂是反映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实证。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也正说明其重要性。

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天主教是较早进入山西的西方宗教，教堂形式也成为山西省最早的西方建筑形式之一。山西天主教堂主要是明末清初由意大利耶稣会^①传入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影响下，教堂或多或少融入了山西地区的当地建筑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既有别于西方教堂，又不同于山西传统建筑，在这种微妙的建筑形式变化中，突出表现了西式教堂本土化的特点。这是山西天主教堂的特殊性所在，它对当地的建造技术、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当代建筑的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天主教堂——这种纯粹属于舶来物的建筑类型，融入了中华本土的建筑文化，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更清晰的展示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和传播的过程，进而成为其它近代建筑研究的基石；并且，通过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可以为今后保护、改造和利用山西教堂提供参考。

1.3 研究的现状

中国近代教堂建筑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尤其在近几年出现一批针对教堂建筑的专门性论文研究，如同济大学倪群的硕士论文《上海教堂建筑研究》（198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胡婕的硕士论文《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陕西宗教建筑——教堂建筑研

^①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7页。

究》(2003);西南交通大学曹伦的硕士论文《近代川西天主教教堂建筑》(2003);重庆大学黄瑶的硕士论文《重庆近代天主教堂研究》(2003);福建师范大学张金红的硕士论文《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200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硕士论文《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2004)、王莉的硕士论文《清末民国时期陕北教堂建筑研究》(2006)、孙军华的硕士论文《陕西近代教堂建筑的保护历史及现状研究》(2006)、高彩霞的硕士论文《19世纪中叶以后的宁夏教堂建筑研究》(2006)、何畅的硕士论文《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研究》(2006);太原理工大学李瑾的硕士论文《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考察之南境教区》(2006)等等。

有关山西近代教堂建筑方面的论述还十分有限,散见于宗教杂志、地方文献中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个别地方性教会资料等,而且大多以宗教或旅游的角度宣传教堂建筑,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从建筑角度对山西天主教堂的系统研究才刚起步。本文从这一角度对天主教堂进行研究,是对山西近代建筑研究的推进。

1.4 研究的方法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天主教传教士入晋着手,对教堂建筑原型与衍化形态进行综合分析。以社会学和历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阐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史实,研究、分析近代晋北天主教堂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总体上考察在建筑变化过程中,各种历史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的调整、融汇;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分析诸多因素对天主教堂的影响,最后发现,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对教堂的风格、形式和规模等形成重要影响,本文即以此为线索。

本文还运用了对比的研究方法,把山西近代教堂与西方教堂的原型作对比。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各个地区不尽相同的民俗风情以及各个教区国籍不同的传教士的影响,山西教堂在形式风格、渊源以及演变等方面呈现相互交错的现象。这样,单纯以教会内部中外势力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进行研究,就无法辨识教堂在西方型制方面与地方传统的融合,而采用与西方原型教堂作对比,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山西近代教堂自身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建筑形式、平面功能布局、结构造型、细部装饰等几个方面的对比,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中寻找、分析产生这种本土化教堂的原因。

另外,本文运用了实证法,从山西北部的各个教区,选取典型的教堂作为实测与分析对象,并结合当地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山西地区属于黄土高原,但由于地理

条件、环境气候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建筑类型和风格也不尽相同，因此，各西式教堂的本土化特色也有细微的差别。通过实地勘查，获取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目睹教堂与当地风土民俗以及建筑的关系，从而使论述更具说服力。

1.5 论文的创新点

在查阅了大量的背景资料，调研了北境教区二十多个近代教堂之后，通过分析近代天主教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比修建于不同时期的各个教堂的风格特点，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实证，本文提出了近代天主教堂研究领域的以下四个创新点：

- 一，以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为线索，提出了天主教堂发展的四个阶段。即 1620~1844 年的“庙宇式教堂”；1844~1924 年的“仿欧式教堂”；1924~1949 年的“中西合璧式教堂”；1949~至今的“本土式教堂”。
- 二，总结了北境教区教堂的“三要素”，即大厅、祭坛、以及起图腾崇拜作用的主立面。
- 三，总结了北境教区教堂的平面变化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面形式逐步由严肃规整的对称格局演化为灵活变通的实用性格局。
- 四，发现了北境教区教堂的主立面总是或者朝南，满足传统观念；或者朝向主要居民区、道路，方便教民朝拜。

以上四个创新点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作具体论述。

1.6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概括介绍了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现状、方法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六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论述性的介绍天主教传入山西的背景，以及山西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情况，随后以两条相互对应的链条为基础来分析教堂，一条是历史事件的叙述，一条是建筑形式的划分。以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为线索，将教堂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样使教堂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明确、一目了然。然后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与西方教堂的原型作对比，总结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教堂的营造理念、美学和文化特征，从而揭示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本土化特征和过程，以及促成本土化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结束语，总结归纳全文，再次明确文章的论点和结论。

第二章 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及山西北境教堂分布情况

外来西方建筑文化的早期植入形式之一是教堂。天主教作为最早进入山西的西方宗教之一，直接冲击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建筑类型——山西天主教堂。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源于犹太教。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传扬的思想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体系。它由许多教派组成，天主教与东正教、基督教（也称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也称“公教”，这个字起源于希腊文 *katholike ekklesia*，意思是“公教会”。由于天主教是在罗马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也称罗马公教（Roman Catholicism），在我国又称为“加特里教”。^①

2.1 天主教在晋的传入与发展

天主教传入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据资料显示，在唐朝年间（公元600多年），景教传入中国陕西，但经过二百年左右消亡。随后，在公元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柏郎嘉宾和法国多明我会士隆如美先后来中国传教^②。但在元朝覆灭之后，天主教再次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了。天主教这两次传入中国，并未造成深远影响，也未留下已知的任何教堂遗迹。

唐朝年间，景教是否曾经传入山西，尚无证可考。但在元代，天主教已经传入山西。“在元初，大同为西京，据《元史·世祖本纪》所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庚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起输赋’。至元二十五年（1288）西京才改称为大同路。也里可温是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也里可温教徒属于

^① 十一世纪五十年代(1054年)以前，凡信仰基督者，通称为基督徒。教会称为基督教会(拉丁文 *Chris Tianiomus*)。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方分裂后，西方教会自称“公教”(拉丁文 *Ecclesia Catholica*)，也即天主教。东方教会自称“正教”(拉丁文 *Ecclesia Orthodoxa*)，也即东正教。十六世纪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内产生了与罗马教皇相抗衡的“抗罗宗”(拉丁文 *Protestantes*)，也即“新教”。以上三种后世史书上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三大教派，在外文中，各有专名，一目了然。但在我国，由于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一词，在我国就有了两个涵义：一指世界性公认的基督教各派总称；二指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早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当时没有“公教”或天主教这个名词，通称为基督教，故为“是一个由基督教分裂出去的教派”，而不能为其它。

^② 刘宏刚，赵瑛，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1页。

天主教的聂斯多略派，即‘景教’。法国人威廉·卢布鲁克于公元1253年奉法王之命，出使蒙古帝国，在他著的《威廉·卢布鲁克游记》一书中记有‘契丹有十五个城市有景教徒，他们在西京有一主教区……’，在《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中称‘景教在这个时期的中国走向兴旺是由于这位强有力的国王阔里吉思的大力保护。1294年景教的保护者与来自罗马的入侵者相联合，并率其部落全体基督教徒转向罗马，在大同建立一所罗马天主教教堂……’，可见远在十三世纪中叶大同已有天主教徒，并且建有中国早期的天主教教堂一座。由此我们知道天主教在大同至元代已颇为兴盛。”^①

天主教的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万历十年（1582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传入。并于1620年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传入山西。

2.1.1 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历程

通过调研发现，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对教堂建筑的风格、形式和规模等形成重要影响。本文以此为线索，将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2.1.1.1 第一阶段：本土文化主导期（1620~1844年）

1620年，天主教传入山西，并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迎合当地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在1724年，因“礼仪之争”^②，清政府正式颁布了禁教令，教会从此呈现大衰退的现象。往后直到1844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教会才再次获得公开传教的自由。在此期间（1620~1844年），不论是1620~1724年的教会发展期，还是1724~1840年的教会衰退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教会内部，本土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教会处于本土文化为主导时期。

天主教进入山西，据史料记载始于1620年。万历末年山西绛州乡试解元韩霖^③在京

① 刘宏刚，赵孺，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2页。

② 礼仪之争——这场冲突是发生在同属西方传教士的不同派别之间，早先入华且已被儒家伦理规范同化了的耶稣会修士主张尊重中国传统习俗，不必过分拘泥于“不许敬拜偶像，，的教规；而刚刚入华不久欲图严伤教规的多明我会修士却执意恪守天主教义和教皇禁令，坚持中国天主教徒必须与传统宗法礼仪和伦理观念彻底决裂。1704年，罗马教皇克利门得十一世针对在华两派传教士的教仪之争颁布了教廷教令，明确禁止中国天主教徒进行敬天、祭孔和拜祖活动，要求废除丧葬之礼和其它宗法礼仪，不许供奉各种神位灵牌。该教令大大地激怒了康熙皇帝，他针锋相对，以强盛的国力作为后盾，对一切反对敬天、祭孔、拜祖礼仪的西洋传教士毫不留情地予以驱逐和囚禁。

③ 韩霖，字雨公，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善诗文，工书法，家藏书数万卷。在北京信奉天主教，洗名多默。

为官，与徐光启相交，遂领洗入教。之后韩霖的兄弟韩云、韩露和同乡绅士段袞(字九章)在北京入教，他们返乡时，将天主教带回绛州，此为山西天主教的起始。韩、段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邀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到绛州(今新绛县)传教，他是第一位进入山西的传教者。^①天主教遂传入山西。

162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qus Lriguault)由开封来山西，在绛州定居。同年，段袞在他的家乡——段家庄建教堂一座，该堂是绛州教区乃至山西天主教史上第一座具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也是中国教会第一座由教徒自发捐献建立的教堂^②，从目前来看，因各种原因，已经无从考证。

此后，在天启五年(1625)，意大利人高一志^③(Alphonsus Vagnoni)入绛州传教。高一志神父到绛州后在韩霖、段袞的庇护下，以西学修身，取得绛州雷刺史的支持，教务兴盛。1625年，绛州教徒有200余人，其中有举贡生员80余人，到崇祯三年(1630)绛州教徒已经激增至2000余人。崇祯四年(1631)，高一志又应蒲州大学士韩圻之邀，到蒲州传教，建立了教堂。^④

此后不久，天主教在绛州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因为李自成率军自四川东上途经这里时，焚烧教堂，致使该处教会一度处于瘫痪。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教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⑤

另一个名为金尼格的耶稣会士，比利时人，崇祯三年(1630)来华，翌年至绛州，于崇祯七年(1635)被高一志派往太原建堂，设立会口，为太原第一任本堂神父，天主教遂传入太原。万密克死后，由他主持山西全省教务，直至清康熙四年(1665)。^⑥

韩霖在家乡有较高的威望，高一志在绛州开教，得韩霖的帮助很多。其家人在他的影响下，都受洗入教。著有《铎》书，引述教理与教会书籍颇多。又与张庚合著《圣教信证》，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传教士上传略与著作的书。

① 引自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9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年12月。另一说法是段袞与韩霖同时入教，随后，他们邀请艾儒略到绛州，并为其家属受洗，其中有韩云、韩露。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67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② 引自段春生，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2005。

③ 高一志，原名王丰肃，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来华传教于广州韶州、南京一带。万历四十四年因在南京建立西式教堂。高竖十字架而激起民愤，被逐至澳门。在1625年，来山西传教直到去世，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火花对于中国教会的信仰传递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响。

④ 段春生，山西开教宗徒高一志神父事略，2005年。

⑤ 同上。

⑥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7页。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南京两大教区，同时另批了九个代牧区^①，山西占其一，归耶稣会士管理。山西首任代牧主教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张安当（Antonius Posateri），当时，山西全省教徒约三千左右，分属于太原、绛州两个堂口。从1716年（康熙55年）至1844年（道光24年），山西和陕西两省教区合二为一，称为山陕教区，归方济各会士管理。”^②其间，在“礼仪之争”的问题上，引发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开端。1724年，雍正正式发出禁教令。山陕教区时间约128年，其中有120年是在清政府禁教时期。当时教会处于极不自由阶段，教堂被封，教产被没收，教士被驱逐，一切宗教活动都不能公开进行，遂转入地下，教会呈现大倒退现象。

当天主教刚刚传入山西时，由于自古以来夏优夷劣、自大排外的民族文化心理，天主教与传统信仰、伦理、风俗的矛盾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当时百姓对天主教并不认可^③，甚至鄙夷，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曾如此描述：“在士大夫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和仇恨外国事物。”^④于是为了使天主教为人所接受，传教士们便设法迎合当地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以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方法，先向当地的上层人士推行天主教，再经由官员把天主教向平民百姓传播。在当地政府的准许和资助下，他们在山西各地兴建了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1724年，禁教令颁布后，西方传教士大部分被驱逐出境，但是仍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在当地教民的蔽护下秘密传教。在此背景下，必然导致教会内部本土势力的强大，相应的，本土文化也能得到更多的体现。

2.1.1.2 第二阶段：欧洲文化主导期（1844~1924年）

鸦片战争后，随着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道光帝被迫废弛了禁教令^⑤，

① 代牧区，即非正统区。中国有正统教区，始于194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通过“圣统制”的建立，将原来的代牧区改变为正统主教区。多年来，中国教会列为传教区教会，统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各教区所有主教均为代牧性质。以它地主教名衔管理中国某一教区。论教权，正统与代牧是一样的，名不同而实权同。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8页。

③ 王守恩，刘安荣，近代山西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排拒与皈依——以刘大鹏、席胜魔为例，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4页。

④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08页。

⑤ 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埔通商条约第二十二条款便规定：“任何法国人，只要到了五口岸中的一个，不论他的居留时期有多长，都能租用房舍仓库以储存货物，也能租用地皮以建造房舍仓库。法国人同样可以建造教堂、医院、养老院、学校和公墓。”1585年中国和英法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第十三条款也规定：“基于基督宗教的主旨在于引导人修德行善，所以基督宗教团体成员都享有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保证，并能自由地过宗教信仰生活；至放和平前

并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得到了极大的财力和政治支持。他们通过赈灾、行医、戒毒或以物质利益诱人等布道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教民，甚至还插手地方政治事务^①，并激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但由于运动的失败，教会内部欧洲势力强盛的格局并未改变，因此，直到1924年之前的天主教是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再次获得了公开传教的自由。1844年2月，山陕教区改组，两省又重新划分为各自独立的教区。首任山西教区主教为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杜喜伯（Gabriel Grioglii）。当时全省有外籍教士4人，中国籍神父16人，教徒8000人。^②此后，西方传教士大批来晋，深入各地城乡传教；天主教在山西广泛地传播开来。

杜喜伯主持山西教务17年，于1870年辞职回国。意大利方济格会士江类思继任主教，并在太原大北街东三道巷（今解放路369号）建立主教堂。他因年老多病于1876年申报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方济格会士艾士杰为助理主教，实际负责山西教务。随着教徒增加，教务繁忙，罗马教廷于1890年又将山西教区划分为南北两境。北境教区包括大同、太原、朔州、五台、阳曲、汾阳、榆次等51个州县，教徒约1.3万余人，由意大利方济格会士管辖，因主教座堂设于太原，也称太原教区。南境教区包括长治、凤台、洪洞、绛州、蒲县、临汾等54个州县，教徒约9000余人，归荷兰方济格会士管辖，因主教座堂设在潞安，亦称潞安教区。^③此后十年间，天主教在山西发展更快，教徒数量大增。

到1900年天主教已传入山西58个州县及口外7厅（当时隶属山西）。至于教徒的数量，教会人士说北境教区1.7万余人，南境教区1.8万余人^④，但未将七厅包括在内。所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山西天主教徒的数量应为上述北境1.7万余人、南境1.8万余人，加上运动过后山西官方与教会订立的《山西口外七厅教案合同》载明的22470人^⑤，约为57470余人。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山西天主教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传教士和教徒大量被

往内地的传教士，也将保证予以有效的保护”。

① 王守恩，刘安荣，17~1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晋阳学刊，2003年，第3期，第52~53页。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8页。

③ 同上，第368~369页。

④ 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Z】，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Z】，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杀，教堂大量被焚毁。

运动失败后，各地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信教者日益增多，教区范围过大，不利于教务的管理，罗马教廷遂将山西南、北境教区划分成若干新的教区。^①

虽然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但证明了借助政治力量并不能使中华民族屈服，反而会激发中国人民对教会的仇恨情绪，从而使教会意识到尊重中国民族感情和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如罗马教廷训令传教士们今后要少管或不管教徒诉讼的事。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今后只受理与法国传教士有关的案件，其他国籍的传教士请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公使交涉^②，明确放弃其在中国的保教权。但在当时，这种意识只是处于酝酿阶段，教会内部西方势力强盛的格局并未改变。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觉醒，这种意识才转变为一种明确的倾向。

2.1.1.3 第三阶段：本土化探索期（1924~1949年）

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③”在上海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天主教进入了本土化探索期，并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改革：“一、开始将教会与保教权脱钩；二、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的地位；三、提倡以文化传教的方法，注重天主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调和与融合。^④”。这种探索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前。

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的《夫至大^⑤》通谕，对于刚恒毅^⑥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与教律上的有力支撑点。

①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9页。

②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M，纽约，1929年，第548页。

③ 1924年5月，刚恒毅在上海召集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次主教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其决议第一次以教会的名义公开申明：“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并明白表示要尽早实现由本地神职人员担任主教。大会还重新把中国的传教区划分为17个人教区。

④ 顾卫民，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12卷（第3期），第51~52页。

⑤ 1919年11月，罗马教廷向全世界教会发布了一个通谕，由于其行文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为起首，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遂被称为“夫至大”通谕，它指出，外籍传教士应该与本地司铎和人民加强联系和沟通，并在传教中适应本地的文化和社会。同时，通谕还认为，一个在异国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人应当置父母之邦的利益与光荣于教会之下，反对当时教会中的殖民主义倾向。

⑥ 刚恒毅(1876—1958年)，字高伟，意大利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第一任罗马天主教宗座驻华代表。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①”是发生于新教与文化界的一场思想意识的冲突，但对同样是洋教的“天主教”也一同在时代背景中饱受冲撞。

随着《夫至大》通谕的颁布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便开始酝酿的天主教本土化倾向终于开花结果。1924年由刚恒毅在上海主持的“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正式拉开了天主教本土化的帷幕。1926年10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亲自祝圣六位中国主教，其中就包括山西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②，汾阳教区也成为了山西省第一个国籍教区。为了全面的推进本土化进程，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中式圣堂、中式圣艺及神学、礼仪的本土化等。

刚恒毅认为佛教的经文非常美妙，值得天主教借鉴。比如“南无阿弥陀佛，救世救人慈悲之主，弟子诚心诚意求赐重生净土，大慈大悲菩萨就我脱免尘世劫数，请照顾我，犹如水中之月的诚心”之句，“假若以基督之名代替，我们也可以诵念”^③。他还访问过中国的一个佛教寺院，僧人开门很有礼貌，餐厅里有四十多个替光头的学生，默默的念经和吃饭，很像天主教会里的修士，“假如将有一天在中国也盛行隐修院的生活，也不必把西方的方式搬过来，因为有了现存的一切。只要把启示的真理带来就够了。把他们

1892年开始进入修道院学习，1899年成为神父。求学期间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一定成绩。1918年开始担任副主教，1921年成为主教。当时，由于中国正在兴起反对基督教的社会运动。罗马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國化。1922年派遣刚恒毅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协助全国各主教开展教务。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天主教区。1929年他在中國创立主徒会，成为一个完全中國人的修会。1932年回国，1952年升任为教廷的枢机主教。

① 民国十一年（1922）中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出席代表有来自三十多个國家的外籍学生的观察员一百四十六人，中國各省有代表四百多人。该次大会聘请霍德进讲演《基督教与国际》、法国蒙博上讲《基督教与平民运动》、德国某哲学家讲演《基督教与哲学》、巴黎大学一博士讲演《基督教与文化》、丹麦学生代表讲演《基督教与实业》等。北京大学的一群“反宗教”的学生，得悉四月间在北平召开“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的讯息后，即率先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各地学生团体闻讯，有北京高师、保定直隶高师、长沙淋乡中学、太原、广东、南京等各地响应反宗教、反基督教同盟等团体。他们提出：“我们白誓为人类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悲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应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② 陈国砥主教，圣名阿洛苏斯，1875年11月7日出生于山西潞安阳村，他的另一个兄弟也是神父。他于1896年10月4日于洞儿沟加入方济各会；于1903年3月13日晋铎。“庚子事变”以后，曾被委派调查山西教案事宜，以后又任两位意大利主教的中文秘书。他在山西太原修院教授拉丁文和护教学。1911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1926年5月10日升任山西汾阳教区守座代牧。他的教区有10个县，160万人口，1万余名天主教徒，15名神父，88座教堂。

③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M]，台南，主徒会出版，1982年，第170页。

祷告的佛及其他神祇的名以他们不知的天主之名代替^①”。他还注意到教外人向观音菩萨和其他神祇摆的供桌和供品，不同于天主教徒摆的西式供桌和供品。他也注意到了外教人的供桌和供品与天主教的主要特征非常相似，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仅把神像更换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其他部分？宗徒们曾经接受了罗马富于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也这样做？”^②在他看来，只要宗教能够体现对人类的关怀与博爱的最基本精神，就不必拘泥于教义的完整性和教规的约束性；只要任何外在形式会使中国人感到陌生和反感，就有必要加以变通和调整。在这里，宗徒保禄的“为一切人而改变一切”的原则与中国传统“入境随俗”的古训，是完全一致的。^③

从1924~1949年，山西天主教处于本土化探索期，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 一， 改善了与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政府的关系。“1911年阎锡山闹革命时，曾到河曲在李神父的园子里住过一个时期。日后，阎锡山总未忘记希贤主教对他的这般恩情，他任山西省长以后，对传教事业给予了适当的照顾。”^④
- 二， 先后成立了汾阳、洪洞两个国籍教区，并培养了大量的本土神职人员，提升了中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的地位。尤其是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由教宗比约十一亲自祝圣。
- 三， 重新提倡文化传教的方法，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民间艺术，并将其反映到教会建筑中。如建于1931年的大同许堡天主堂、1939年的朔州上坡天主堂等。

与欧洲文化主导期相比，探索期的天主教更尊重当地的民族性和本土文化，并致力于欧洲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2.1.1.4 第四阶段：本土化成熟期（1949年~至今）

1949年建国后，教会中的外籍传教士被陆续遣送回国，本土传教士得到了教会的领导权，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突飞猛进，并最终得以实现。本籍教区、本籍修会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中式圣堂、中式圣艺也已发展成熟；而神学、礼仪等也都实现了本土化。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M]，台南，主徒会出版，1982年，第202~203页。

②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M]，台南，主徒会出版，1982年，第170页。

③ 顾卫民，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第96~97页。

④ 韩铎民(P.Lodoricia.He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年，第35页。

由于这部分内容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不作为研究的重点。

2.1.2 山西教区的历史沿革

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划分为北境和南境两教区，至此山西教区解除。北境教区由于主教座堂设在太原，又称太原教区，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主教管理，北境教区所管辖地区范围包括太原、大同、汾州、宁武、朔平五府、忻州、代州、永宁、平定、朔州、浑源、应州、保德、苛岚九州，以及阳曲县、榆次等51州县，教徒一万三千余人。南境教区主教府坐落于潞安，又称潞安教区，首任主教为荷兰籍方济各会士艾定禄（Martinus Poell），所辖54个州县，教徒九千余人。至1900年山西北境教区信徒总数达一万七千余人，中外国神父31人，大小教堂200余座。山西南境教区信徒一万余人。^①

1900年之后，信教者日益增多，罗马教廷遂将北境、南境教区划分成若干新的教区：1922年，荷兰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成立大同教区，将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6县划归管理，总堂设于大同城内，首任主教为邓维道。1926年从北境教区划出汾阳教区，辖汾阳、孝义、平遥等15县，总堂设于汾阳县城，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当时称之为“国籍教区”。同年，划出朔县教区，所辖朔县、宁武，偏关等15县，由德国方济格会士管理，首任主教为俞广仁，总堂设于朔县米西马庄村（现新安庄村）。1932年，划榆次、平定、清源等10县为榆次教区，由意大利方济格会士管辖，首任主教富济才，总堂设于榆次县内。新的太原教区管辖太原、阳曲、五台、定襄、崞县和忻县地区，总堂设在太原。1932年，南境划分出洪洞教区，这是山西又一处“国籍教区”。1936年，划分出绛州教区，同新的潞安教区一起，仍由荷兰籍方济格会士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山西省教务委员会于1982年6月按行政区重新划分了山西的教区，即：太原教区，辖太原市，大同教区，辖大同市；雁北教区，辖雁北地区；晋中教区，辖晋中地区；吕梁教区，辖吕梁地区，临汾教区，辖临汾地区；运城教区，辖运城地区，长治教区，辖长治市；晋东南教区，辖晋东南地区，忻县教区由于没有常住神父，直属省教务委员会管辖。^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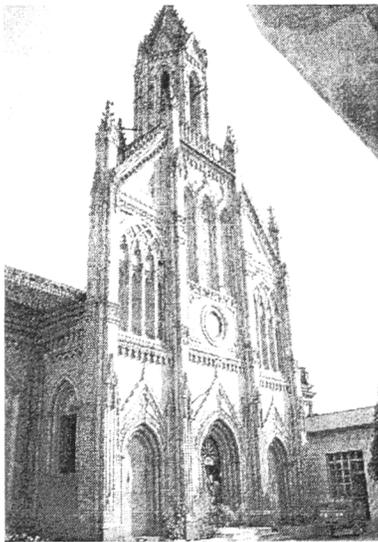
① 引自郭崇禧，山西天主教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57辑，1988年，第5页。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8~369页。

2.1.3 在晋天主教的修会与传教士

天主教的教堂形式和传教方式同它的传播组织——天主教会有密切的联系，受到其宗教传统和思想主张的影响。山西近代天主教从 1620 年传入山西开始，大部分时间是由方济各会管理。方济各会^①的字面意思是小兄弟会，其主要宗旨是确保教会的统一和权力，抨击各种异端的活动，要求会士学习耶稣的谦和与节欲生活，宣扬“清贫福音”，要教徒安于贫困，不要参加反教会的社会运动。在中国，方济各会是一支主要的传教力量，管辖 27 个教区，分布在山东、陕西、湖南、湖北、甘肃等地。

近代期间，1890 年之前整个山西教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管理，随后的划分，北境教区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管理，南境教区是由荷兰籍的方济各会士管辖。另外，1922 年，大同教区建立，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管理，1926 年，朔县教区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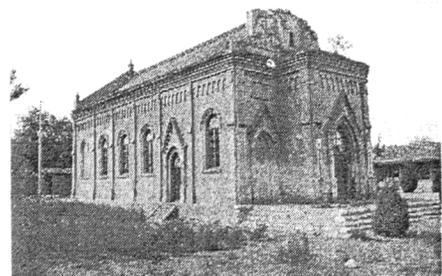
临县青塘天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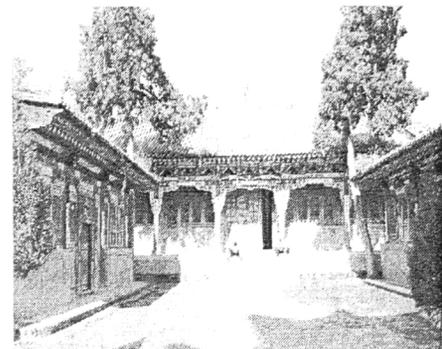
太原天主堂



阪寺山圣母堂



朔州石碛峪天主堂



忻州大堡沟天主堂

图 2-1 山西北境教区的各式教堂

Figure 2-1 Churches in North Parish of Shanxi Province

^① 即耶稣多明我会，是天主教三大修会之一，12 世纪初，由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创立。

由德国方济各会士管理。所以，在山西北境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意大利方济各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代表不同国家的修会是以本国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在教堂式样的选择上，更多的是以本国的教堂为蓝本。山西北境教区的教堂在外籍传教士的管理之下，有的教堂采用巴洛克形式，像阪寺山圣母堂；有的采用罗马风形式，像太原天主总堂；有的采用哥特形式，像临县青塘天主堂；有的采用多种建筑符号的混合形式，像朔州石碣峪天主堂，同时具备中国传统式、哥特式、罗马风式三种建筑风格的元素符号；同时还有个别教堂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图 2-1）。

整个山西的教堂大多是在外籍神父的主持下修建的，一方面，他们受到本国宗教建筑理念的影响，主持修建的教堂在风格上略有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神父本人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性格等对教堂的形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天主教徒占主要比例的国家里，人们的宗教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来到山西的传教士们也恪守着传统的理念。在近代的一些历史事件中，大部分西方传教士表现出，一方面同情中国难民，以自己的能力救济、帮助难民；另一方面则置身度外，不参与、不赞成战争。这些传教士的思想行为反映出，他们遵循的是传统的天主教信念，在教堂形式的选择上，视传统的西式教堂形式为正统。

2.2 山西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况

天主教传入北境教区时间较晚，只有太原稍早一些，于1635年传入，其它大部分地区晚于南境至少约70年。明末清初，教堂建筑主要分布于太原地区。据《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记载，“另一耶稣会士金尼格，比利时人。崇祯三年（1630）来华，翌年至绛州，于崇祯七年（1635）被高一志派往太原建堂，设立会口，为太原第一任本堂神父。”^①在百年禁教期间，山西的教堂建筑发展缓慢，鲜有新堂建成。

从1844年天主教弛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山西天主教堂发展迅速。北境教区（图2-2）的教堂分布点很多，主要以六大块最为集中，那就是以大同为中心，以朔县（今朔州）为中心，以忻县（今忻州）为中心，以汾阳为中心，以太原为中心，以榆次为中心发展的附近地区。由于忻县地区的教务历来归属太原管辖，所以

^①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1996年。

后来把北境划分为五大教区，除忻县外，其余五个中心点分别成为新教区的主教座堂所在地。

从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山西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况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主教座堂所在地位于五大教区的经济中心。以汾阳教区最为典型，教区成立前，以临县的教务最为发达，欲将其拟定为主教府所在地，但后来考虑到交通因素，遂将主教府改到汾阳。各教区以教区的堂区会口一即有公共祈祷场所和神父住宅的堂点，为中心，向周围各个县区的城镇辐射，然后再以各个城镇向附近乡村扩散，呈树形网状发展；其二，位于乡村的教堂建筑数量多于城镇。天主教教徒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农村人口，传教士深入偏僻的山区、高地，建立教堂，在丛山之中的教堂，有时会成为教徒朝圣之地，像太原教区的阪寺山圣母堂及朔县教区的八台天主堂遗址，去那里的路途遥远，山路崎岖，但朝圣者依然执著向往。

山西省政区



注：方框内的城县以及所属村落到目前均有近代教堂分布，括号中的数字为现存近代教堂的数目；十字处为各教区的主教坐堂所在；灰色区域表示南境教区。

图 2-2 建国前山西北境教区图
Figure 2-2 Shanxi North Parish

* 大同教区

据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费品璋 (Emilius De Vleeschower) 所撰的《大同教区传教史》记载, 在 1697 年山西教区成立之前, 大同、阳高、左云一带便已经有了教友, 皆归北京教区耶稣会士管理。北京传教士前往大同时, 就下榻在大同教友家中。^①

教区成立之前, 教堂大约 8 座, 教友人数 1760 人。1922 年到解放之初, 是教区成立、发展及兴盛时期。据统计: 1927 年大同监牧区有居民 80 多万、教友 2729 人、望教者 2629 人、外籍会士 12 人。1931 年教友人数已达 5000 人左右, 全教区教堂增至 14~15 处。1937 年教区圣母圣心会士 22 名, 教堂 18 处, 分别是大同总堂、榆林、西河河、莫家堡、西册田、马家皂、浑源、西加斗、天镇、灵丘、千千村、胡家窑头、马庄、许堡、南村、张官屯、东辛庄、涧村, 教友 8250 人。^②

大同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教堂分布比较集中而且数量比较少, 仅有五个。其中两个分布在大同市 (市区都司街、南郊区西榆林), 一个在大同县 (许堡村), 还有两个在阳高县 (张官屯、马家皂)。此外大同市区及周边的村庄、城镇还分布着其它一些像修道院、初级小学、医院等教会建筑, 是大同教区的中心传教区。

* 朔县教区

天主教传入朔县在清光绪二年 (1876) 间, 当时朔县城南关八里处有一小村一米昔马庄 (今新安庄), 村民雒兴荣赴内蒙二十四顷地探望闺女转道传入。^③

民国 15 年 (1926), 朔县监牧区成立, 共管辖 15 县, 6 个本堂区。6 个本堂区、县是米昔马庄、沙垆河、峙科、左云、繁峙、河曲, 共有教徒 4335 人, 大堂 4 座, 小堂 17 座, 会口 78 处, 祈祷场所 4 处, 保赤会 2 所, 养老院 1 所。成立监牧区后, 教务日盛, 信教群众日渐增加, 至民国 20 年 (1931), 山阴县境、井坪一带和代县境内也开展了教务, 新建本堂区数处, 并在各本堂区成立了男女初级小学校, 招收教内外儿童入学。17 年成立小修道院 1 处, 培养国籍神职人员, 举办传教先生训练班, 因而教务日盛。至 21 年由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据民国 22 年统计, 教徒由 15 年的 4335 人增至 6887 人, 直至 30 年教徒发展为 11075 人, 望教者 4719 人; 全教区共设本堂神父堂口 19 处, 分别是米昔马庄、沙

① 刘宏刚, 赵媪, 张鼎新, 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 大同, 内部资料, 2006 年, 第 6 页。

② 同上, 第 42 页。

③ 韩铎民 (P.Lodoricia.Hererich), 朔县教区简史, 李树洙 (译), 内部资料, 1963 年, 第 17 页。

堯河、石碣峪、峙科、河曲、繁峙、左云八台、怀仁、雀家窑、鹊儿岭、岱岳、小辛庄、井坪、代县、朔县、上坡、右玉、南磨石、山阴^①；有大堂11座，小堂61座，祈祷所90个，初级小学52所，经言要理学校132所。民国30年（1941）后，处于山区的本堂区逐渐撤回朔县城内，1990年仅朔县南关、沙堯河两处驻有本堂神父。^②

朔县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天主教堂主要分布在朔县（今朔州市）和左云两个区域。其中朔县较多，有6个，它们分别座落于新安庄、沙堯河、石碣峪、南磨石、上坡村和东榆林；左云县分布有两个，分别座落于八台村和鹊儿岭。

* 汾阳教区

天主教传入汾阳距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据上海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汾阳有耶稣会修院1所。^③

光绪十六年（1890），山西教区分为南北境后，汾阳隶属北境教区。民国15年（1926）全国选出6位中国主教，汾阳陈国砥主教即为其中之一。同年，太原教区划分汾阳、离石、临县等15个县为国籍教区。^④

十五个县分了三个外代区

汾阳区：以汾阳为中心，下辖平遥、介休、孝义、文水、交城；

离石区：以离石为中心，下辖柳林镇、方山、中阳、石楼；

青塘区：以临县为中心，下辖兴县、岚县、岢岚。^⑤

汾阳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天主教堂分布比较分散，但以汾阳地区为数最多，一共有三个（市区、杨家庄、后贺家庄）；另外，还有三个分别分布于临县（青塘）、柳林（苇则咀）以及中阳（后岭）。

* 太原教区

天主教于1635年传入太原。据《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记载，“另一耶稣会士金尼格，比利时人。崇祯三年（1630）来华，翌年至绛州，于崇祯七年（1635）被高一志

① 韩铎民(P.Lodoric.Here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年，第74~97页。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4页。

③ 同上，第377页。

④ 同上，第377页。

⑤ 霍成，汾阳教区史，内部资料，1996年，第9页。

派往太原建堂，设立会口，为太原第一任本堂神父。”^①

太原教区主教座堂设于太原城内，所管辖地区包括太原、阳曲、忻县、定襄、崞县、五台6县。据民国35年（1946）统计，太原教区共有23个本堂口，以石岭关划线，关南11个，关北12个，由中外籍神父分管。关南有太原总堂、太原南堂、疙潦沟、南社、东涧河、固碾、尧上村、棋子山、河上咀、红沟、大泉沟；关北有忻县南关、董村镇、解原村、奇村镇、东呼延5处，崞县、原平镇、轩岗、兰村4处，五台山的沟南村、东冶镇2处，定襄县1处等。^②

太原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天主教堂数量较多，共有十个：其中一个分布在原平（墩阳），五个在忻州（大堡沟、武家庄、地黄梁、老安梁及大南宋），两个在阳曲（阪寺山、红沟），还有两个在太原（市区、疙潦沟）。忻州山区有很多村落全村信教，由于地方偏远，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村内天主教堂得以留存至今。

* 榆次教区

天主教传入榆次教区是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太原西柳林的教徒在榆次经商，逐渐将天主教传播到韩村、豆腐庄和海底岭一带，后来又发展到王都、六堡、使赵、李坊、流村、北砖井、上营、源涡、聂村、安宁等村及城内各地（街）。据民国榆次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县南各村有信奉天主教者，日渐增多。全县天主教增至十八、九处”。^③

1932年榆次教区从太原教区划出，成立了榆次监牧区，意籍方济格会士富济才神父被委任为监牧，管理10个县区，（榆次、太谷、祁县、清源、徐沟、平定、盂县、昔阳、寿阳等），当时共有中外教士10位，正规教堂24座，小型祈祷所40余处，教徒约1300余人。^④

榆次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天主教堂数量极少，只有两座。其中一座分布在榆次市区，另一座分布在阳泉市河底村。

①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1996年。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1~372页。

③ 天主教榆次教区沿革，内部资料，第1页。

④ 同②，第380页。

2.3 与南境教区教堂分布情况的比较

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情况与南境一样，均是位于乡村的教堂数量多于城镇，天主教徒最主要的来源都是农村。教徒们往往都选择位于丛山之中、风景秀丽的教堂作为朝圣之地，北有朔县教区的左云八台天主堂，南有洪洞教区的韩罗堰天教堂。

同时，由于天主教传入北境教区的时间远远晚于南境，发展滞后，教会的覆盖面并不如南境那样广阔、深入，因此，教堂分布情况与南境也有所不同：其一，北境教区的主教座堂往往位于教区的经济中心，如大同教区、太原教区；而南境教区的主教座堂则位于教区的地理中心，如潞安教区。其二，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相对集中，如大同教区、朔县教区；而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则比较分散，如潞安教区（图 2-2）。

2.4 小结

天主教从明末传入山西至今，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历史纷纭变更，天主教的发展也经历着波折起伏。纵观整个近代历史，天主教发展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教义的传播不仅依靠外籍传教士，还有当地的教徒。像北境教区的一些村庄，天主教是由外地经商的商人或出外探亲的村民带回来的，在外出期间，他们受感入教，并在他的家乡大力宣扬，如此一来，天主教传播更加迅速。到十九世纪末，教义几乎传遍了山西的各个城镇和村落。庚子赔款后，天主教发展更加迅猛，有的地区和村镇全部村民都信教，如忻州大堡沟、武家庄等，使得天主教成为当地最大的宗教势力之一。

西方的宗教文化传入山西，从相互接触、碰撞到认可、融合，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明末的耶稣会士进入绛州传教，把天主教义扎根于山西这片土地，他们设法迎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使天主教在山西获得初步发展。但 1724 年禁教令的颁布让天主教的传播转入地下，为了生存，西方传教士必须求助于当地的教民。可以说，初期的教会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以傲慢的态度再一次把西方的宗教带入山西，强行推行西式教堂，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侵蚀，引发了很多冲突，集中体现在教案频繁发生，尤其是 1900 年的庚子教案达到极点。庚子教案后，教会中的欧洲势力开始反思自己的传教策略，开始意识到尊重当地人的民族感情和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为日后的天主教本土化埋下了种子。但在当时由于斗争的失败，并未能改变教会中欧洲势力为主导的格局。直

到 1924 年，以实现天主教本土化为目的的“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召开后，教会中本土势力上升，传教活动才逐渐采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在教堂的格局上，尊重当地的传统生活习惯；装饰上，采用中国古典元素符号作为局部的装饰构件，成为新式教堂的早期尝试。这样的妥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天主教在山西不断成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成为一支很有实力的西方宗教派别。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中，虽然有冲突的创伤和遗憾，但也带来了交流的果实与收获，在这一过程中，教堂建筑逐步走向成熟。

山西北境教区已知的现存近代教堂列表

附表 2-1

序号	地区	教堂	地点	建造年代	主持神父或建造者 (国籍)
大同教区的教堂					
1	大同市	圣母圣心堂 (主教座堂)	都司街 4 号	1889 年 1906 年重建	敖殿臣 (一)
2	大同市	西榆林天主堂	南郊区西榆林	1896 年 1903 年重建	敖殿臣 (一)
3	大同县	许堡天主堂	许堡村	1931 年	田种德 (比)
4	阳高县	张官屯天主堂	张官屯村	1934 年	田种德 (比)
5	阳高县	马家皂天主堂	马家皂村	1913 年	彭毓林(Poncipe) (意)
朔县教区的教堂					
6	朔州市	新安庄天主堂 (主教座堂)	新安庄村	1880 年 1913 年重建	任神父(P. Antonius. Eippaizoue) (意)
7	朔州市	沙墁河天主堂	沙墁河村	1903 年	—
8	朔州市	石碣峪天主堂	石碣峪村	1920 年	—
9	朔州市	南磨石天主堂	南磨石村	1940 年	桂万才(Fr. Jodocus Guegel) (德)
10	朔州市	上坡天主堂	上坡村	1939 年	同上
11	朔州市	东榆林天主堂	东榆林村	1940 年	同上
12	左云县	八台天主堂	八台村	1876 年 1914 年重建	柏神父(Alexander. Piergili) (意)
13	左云县	鹊儿岭天主堂	鹊儿岭村	—	—
汾阳教区的教堂					
14	汾阳市	汾阳天主堂 (主教座堂)	汾阳市区	1933 年	刘锦文 (中)
15	汾阳市	杨家庄安多尼堂	杨家庄	1910 年	—
16	汾阳市	后贺家庄天主堂	后贺家庄	1905 年	—

17	临县	耶稣圣心堂	青塘村	1916年	富济才(Pietro Ermenegildo Focaccia) (意)
18	柳林县	苇则咀天主堂	苇则咀村	1909年	吉神父 (意)
19	中阳县	后岭天主堂	后岭村	1914年	白纯素 (中)
太原教区的教堂					
20	太原市	太原天主堂 (主教座堂)	市区解放路	1870年 1905年重建	凤朝瑞(Agapitus Fiorentini) (意)
21	太原市	疙潦沟天主堂	疙潦沟村	1870~1880年	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 (意)
22	阳曲县	阪寺山圣母堂	阪寺山	1897~1898年	同上
23	阳曲县	红沟天主堂	红沟村	1884年	—
24	忻州市	大堡沟圣母堂	大堡沟	1897年	杨雅各 (中)
25	忻州市	武家庄圣心堂	武家庄	1932年	赵瑞璋 (意)
26	忻州市	老安梁圣家堂	老安梁	1931年	—
27	忻州市	地黄梁天主堂	地黄梁	1934年	邢化民 (中)
28	忻州市	大南宋天主堂	大南宋	—	—
29	原平市	墩阳天主堂	墩阳镇	1924年	— (意)
榆次教区的教堂					
30	榆次市	博爱里天主堂	市区博爱里	1938年	— (意)
31	阳泉市	河底天主堂	河底村	1903年	胡宝善 (中)
<p>注：“—”表示情况不详。</p> <p>关于北境现存的近代教堂，目前尚没有专门的统计资料。本附表是笔者在查阅了山西通志、各市县的地方志、以及各教区的发展史之后，再结合实地调研统计而来。</p>					

第三章 山西天主教堂各阶段的发展概况

从天主教传入山西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三百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堂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经历着变迁。通过调研笔者发现，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对教堂建筑的风格、形式和规模等形成重要影响，论文以此为线索，将教堂建筑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620~1844年是教会发展的本土文化主导期，这一时期的教堂大多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可将其概括为“庙宇式教堂”；从1844~1924年是教会发展的欧洲文化主导期，这一时期的教堂形式以模仿欧式教堂为主，可将其概括为“仿欧式教堂”；从1924~1949年是教会发展的本土化探索期，这一时期的教堂沿袭着“仿欧式教堂”的脉络，开始“很大胆的”融入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并尝试着按照当地的生活习惯改进教堂的空间布局。但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时间短暂，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这一时期的教堂可概括为“中西合璧式教堂”。从1949~至今，是教会发展的本土化成熟期，建国后山西大部分地区教堂的本土化进程被打断，但在一些传统建筑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如太原西柳林，确实受影响，而且形成了成熟的“本土式教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将近代天主教堂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的：

第一，从教堂的建造风格来看。鸦片战争前的教堂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教民捐赠的自家宅院，另一种是教会自己筹资改建或新建的。根据笔者调研发现，鸦片战争前的教堂不论何种来源，建筑风格主要是中国古典样式；即使是教会筹资新建教堂，也摆脱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思维模式。鸦片战争后，欧洲势力急剧膨胀，在西方传教士的主持下，教堂大多是直接以欧洲教堂形式为蓝本进行仿造，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使用的极为有限，“仿欧式教堂”遍布山西。直到1924年，随着“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的召开，中国本土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传统建筑符号在教堂建筑中才得以大胆启用，教堂建筑风格也随之从“仿欧式”转变为“中西合璧式”。建国后，在中国传统建筑工匠聚居的村落，甚至还出现了发展成熟的“本土式教堂”。

第二，从人们的心理变化和传教士的态度转变来看。明末清初天主教刚传入山西，许多地方出现了传教士的身影，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和礼仪习俗，当地人对

此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不理解、不认同^①，同样，对于初来乍到的传教士而言，人单势孤，为了传教，只能设法迎合当地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在这种情形下，早期的教堂形式为了被大众所接受，就尽可能的采用中式风格。到鸦片战争后，山西人民遭受旱灾和动乱的折磨，天主教采取了赈灾和利益吸引的策略，并保护教徒，做出相对有益的举动，人们带着感激和难以形容的卑下心情接受了天主教，成为教徒。同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教会中的西方传教士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在中国常以主人自居，他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受中国人的审判，他们掌握关税，这是财源的大部分，还驻有军队”^②，再加上由来已久的对中国建筑的反感情绪^③，新建教堂大多模仿欧洲形式，尤其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教会获得巨额赔款，在特权的保护下，开始肆无忌惮的大量建造仿欧式教堂。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是教堂发展的高峰期。随后不久，伴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社会上发起了反对基督文化的运动，天主教被迫改变了传教策略，开始主动寻求本土化，于是中西交融的教堂在天主教“本土化”的倡导下出现了。尤其是建国后，在本籍神父的主持下，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民族特色鲜明的本土式教堂。

基于以上原因，教堂在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分别呈现出四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但由于第四阶段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本文只对前三个阶段作具体论述，见第四章。

从教堂的保存情况来看，建于1900年之前的教堂在义和团运动时大部分已经被烧毁，只有极个别的能够幸存至今，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阳曲阪寺山圣母堂。而建于鸦片战争前能遗留至今的教堂更是凤毛麟角。目前，我们已知的现存近代天主教堂绝大多数是1900年之后修建的，其中又以建于1900~1924年的为数较多。

3.1 本土文化主导期的山西天主教堂

从1620~1844年的山西天主教处于本土文化主导期，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堂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教民捐赠的自家宅院，另一种是教会自己筹资改建或新建的。前者的建筑风格自不必说，即使是后者也基本上是按照当地的传统建筑形式兴建，因此形成

① 当天主教刚刚传入山西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曾如此描述：“在上天大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和仇恨外国事物。”

②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台北，天主教徒会，1982年，第84页。

③ 莫勒(A.E.Moule), *The Chinese People—A Handbook on China*, London, 1914年，第89~90页。

了“庙宇式教堂”的建筑风格。随后在 1724 年，颁布了禁教令，天主教遂转入地下，西方传教士大部分被驱逐出境，原有教堂不是被拆毁，就是被转为它用，教会呈现大衰退的现象。

3.1.1 1620~1724 年天主教堂发展期

从 1620~1724 年的山西天主教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时无论是从统治阶级还是到普通老百姓，都弥漫着这样一种心理“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的进步”^①。因此，天主教刚传入山西，自然而然受到当地人的排斥。在此期间，西方传教士们只能设法迎合当地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以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方法，向当地的上层人士推行天主教，并经过官员把天主教向平民百姓传播。如高一志在绛州的传教方法：

“高一志利用韩霖、段袞等人的社会地位，并以其‘西学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的思想原则广泛结交士大夫，尤其得到了绛州刺史雷翀的支持。雷刺史曾发出告示，劝民入教，因而教务大兴”^②。

在当地政府的准许和资助下，山西天主教传播突飞猛进，教民人数迅速增多，因此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便出现了。

早期的天主教堂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由教民捐赠的自家宅院。在教会中，一些家庭条件比较殷实的教民，为了表示信仰的虔诚，往往会把自己闲置的房屋或宅院捐给教会，供教民们祈祷集会之用，这便是最初的教堂。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这种情况在北境教区普遍存在，尤其是当教民数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如朔县教区早期的右玉会口：

“可是在 1712~1714 年间，在右玉地区……。假日期间，教友们都到金马尔谷家聚会祈祷，大家推举金马尔谷为会长，为此，金马尔谷就成为我们教区第一位会长”^③。

另一种是教会自己筹资改建或新建的。由于年代已经久远，关于这个时期教堂的详细记载几乎没有，遗存的建筑更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史料只是一笔带过的提及了于何时何地建有教堂，只有一小部分对教堂的建造情况有支言片语的记录。

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早期的教堂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当地传统建筑改建而成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82年，第84页。

② 崔成，汾阳教区史，内部资料，1996年，第2页。

③ 韩铎民(P.Lodoricia.He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年，第10页。

的。如黄一农在《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中所叙述的：

“天启七年(1627), 绛州筹盖了全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天主堂, 崇祯四年(1631)左右, 绛州一地已有各式教堂三十座, 清初, 更拥有一处全国占地最广的天主堂”^①。随后在文章的插图注解中, 他又补充到: “韩霖兄弟曾於天启七年在绛州城东南购置两栋房屋, 并改建成中国第一座由教徒在地方上捐建的教堂。入清后, 此堂遭知州下令摧毁, 在汤若望的施压下, 地方官被迫以原明王府抵偿, 遂修成当时中国境内占地最广的教堂”^②。

根据以上资料, 山西境内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教堂是由两栋当地传统房屋改建而来的; 入清后中国境内占地最广的教堂又是由原明王府改建的, 1724 年禁教后又改成东雍书院(图 3-1)。据此可以推断, 以上两者均以当地传统建筑风格为主。尤其是前者经考证就是明天启年间段袞在绛州段家庄所建的教堂, 为中国古典建筑风格。有段春生于 2005 年发表的《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为证^③。



图 3-1 清初原明王府改建的教堂
顶部竖有表示天主教的十字架

Figure3-2 Entrance of The Church

注: 据目前所知, 该教堂是 1844 年之前山西唯一的现存教堂

此外, 还有一部分教堂是由教会筹资新建的。如朔县教区简史中所记录的:

“1725 年, 苏努全家又被放逐到右玉城外 20 里的辛堡。这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庄, 位于底窪地区。由于他们在信法方面有一定的基础, 就盖了一座小堂。这是我们教区第一座圣堂”^④。

根据以上资料, 朔县教区第一座小堂, 是由苏努全家主持修建的, 并没有西方传教

① Fortunato Margiotti, *Il cattolicesi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 Roma, 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 1958 年, 第 106-110 页。

② 黄一农, 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 第 14 页。

③ 段春生, 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 内部资料, 2005 年。

④ 韩铎民(P.Lodoricia.Hererich), 朔县教区简史, 李树洙(译), 内部资料, 1963 年, 第 10~11 页。

士参与，同时苏努一家也不曾见过欧式教堂，更不会有相应的建造技术，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座小堂也是当地传统建筑风格，至多像前东雍书院一样加个标志性的十字架而已。

综上所述，早期的天主教堂不论是何种来源，都是以当地的传统建筑风格为主的。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教堂称为“庙宇式”，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一，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以僧人自居，而教堂与寺庙、道观等同属宗教建筑，因此建筑型制上很可能会借鉴或套用庙宇模式。

二，笔者在调研忻州大堡沟天主堂时，曾听当地居民反映，他们是按照修庙的方式修建教堂。这说明把同样是供神的教堂等同于传统的庙宇，是当时居民最原始也是最朴素的想法。

三，刚恒毅主张天主教在中国可以直接套用佛教的一切外在形式，只需把天主教的真理带来就行了^①。这其中当然包括庙宇的建筑型制。

3.1.2 1724~1844年天主教堂衰退期

由于“礼仪之争”，雍正二年（1724）禁教令正式颁布，天主教从此进入了衰退期，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产被没收，教民人数骤减^②，天主教堂也纷纷被拆毁或转为他用。如史料记载：

“该处旧有天主堂于嘉庆十七年经官拆毁”^③。

同时绛州的天主教堂，即原明王府，也被政府收回并创建了东雍书院^④。

在禁教期间，教会的一切活动都转入了地下，但并未消亡，直到1844年，天主教弛禁后，才迎来转机。

3.2 欧洲文化主导期的山西天主教堂

1844~1924年的山西天主教处于欧洲文化主导期。1844年天主教弛禁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教会不但索回了禁教期间被占用的教堂，而且还新建了大量教堂。在

① 顾卫民，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第96~97页。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6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④ 黄一农，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第2页。

西方传教士的把持下，新建的天主教堂主要模仿欧洲形式，呈现出“仿欧式”风格。庚子教案是一场教堂的浩劫，教堂几乎全部被毁灭，仅有少数建于山内偏远地区的幸免于难，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山西天主教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再次急剧膨胀，“仿欧式教堂”以更为迅猛的势头遍布山西。

3.2.1 1844~1860年天主教堂恢复期

从1844年至1860年的近二十年间，西方列强两度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接踵而至的外患，使中国历经了划时代的巨变。在这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传教士们跟随商船和军舰来到中国，从沿海口岸渗入偏僻的内地和遥远的边陲，设立教堂，划分教区，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势力。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径直深入内地，与自雍正以来在禁教政策之下备受压抑的中国信徒们取得联络，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信仰上的联系。传教事业在列强的炮火下取得长足的推进和发展。^①

在此期间，山西天主教堂的发展，主要以两种方式获得教会用房，增加教堂建筑：一是清政府赔偿在禁教时期损失的教堂，二是传教士索要被当地人改作它用的教会建筑。

在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其中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道光发布了上谕，不仅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给还天主堂旧址。并发布告示：“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②

在这种形式下，重建的教堂和被索回的教堂相继重新成为天主教的财产，如1860年（咸丰十年），拨款重修的绛州段家庄天主教堂。另外，交还旧址的如1861年（咸丰十一年），法国教士梁多明面见山西巡抚英桂，要求查还绛州的“东雍书院”，该书院清初为教堂（图3-1），雍正禁教后改为书院，祀奉孔子诸贤。当然，由于地方官绅反对，在年底，总理衙门照会拒绝，但法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坚决要求归还原址。在1863年（同治二年），山西主教派教士张武良终于至绛州接受了东雍书院。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①

北境教区天主教传入较晚，其早期发展的相关记载比较稀缺。

3.2.2 1860~1900 年天主教堂扩张期

天主教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的权利变为合法，虽然这些条款曾一度使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然而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激起了强烈的反感，成为导致波澜迭起的教案的根源之一。从 1860 至 1900 年，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到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到处建起立有十字架的教堂。不过，“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 1860 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 1860 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于是，反教运动，犹如潜动的暗流演化为奔涌的岩浆，喷吐而出，遍布于基督教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②它在空间上规模大，时间上历时久，程度剧烈。

1860 年以后，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教士大量占有田产，扩展教会势力，吸收无地农民入教，天主教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再加上大量的教案赔款和教徒的奉献，使天主教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凭借这些资金，在这段时间里，天主教在山西的教会建筑大量兴建，据资料显示，北境教区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在任副主教与主教期内（1876—1900 年）新建的建筑有：洞儿沟方济各会院、河西圪燎沟大教堂、清源梁泉道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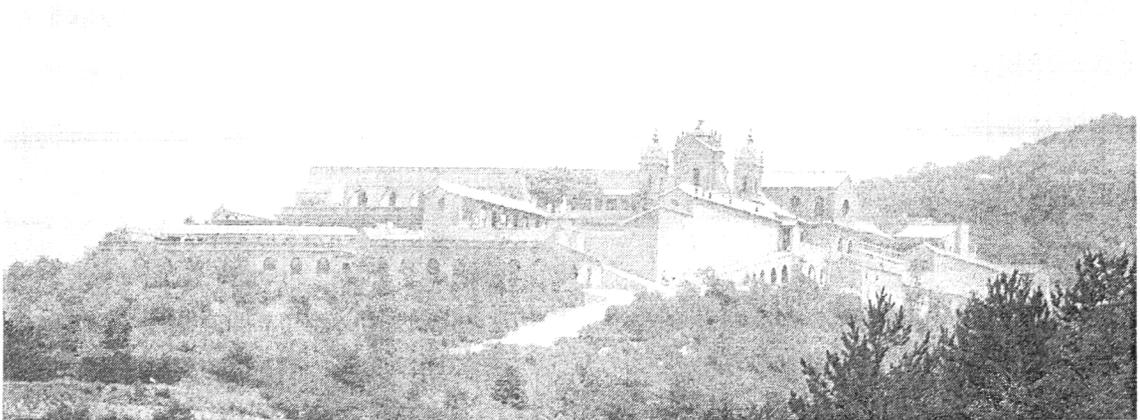


图 3-2 板寺山教堂

Figure3-3 Bansishan Church

①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新绛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第 613 页。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74 页。

阪寺山圣母堂(图3-2)、阳曲县红沟、河上咀、窑子上教堂、以及其它大小教堂六十余处。此外,还在太原城内创立了正式修道院、修女院、育婴院、学校和大北门外西涧河教士坟地等。^①

在此期间,由于教会内部西方传教士的强大势力,新建教堂的建筑风格很受这些传教士的影响。Helen Wiley Dutton在《教务杂志》中写到:“(传教士)他们初来中国时,建造的住宅与其本国正在流行的建筑样式大体一致”^②。之所以这样,部分因为传教士的思乡情结,麦嘉湖(J. Macgowan)在谈到福州的一个教堂时,这样说:“教堂的设立,不仅象征着在这块异教的土地上他们仍忠诚于上帝,而且令其时刻回忆起曾经度过快乐童年时光的家乡。他们从来没想到通过模仿东方的建筑式样来建造他们自己的神圣殿堂,虽然这种建筑式样在东方人认为是其思想最高表达的寺庙里充分展示着它的美丽。这个教堂的原型为主持该堂传教士早年生活地区附近的教区教堂。那个教堂的照片,他从来没有丢失过”^③;部分因为传教士非专业建筑行业人员,“十九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大多是自己凭印象绘制并监工完成的,甚至还有从国外带来旧图纸进行仿造的”^④。

基于以上原因,这段时期大量的欧式教堂在山西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受到当地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制约,尤其是经由本地工匠的理解,教堂不可避免的具备了一些当地的本土特色,从而只能将其称之为“仿欧式教堂”。

3.2.3 1900年庚子教案——天主教堂的焚毁

1900年,山西的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巨大创伤,教士教徒被杀,主教教堂和附属教会建筑几乎全部被毁灭,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教堂也被焚毁,象征天主教的钟楼和十字架被拆掉,祭坛被砸烂,仅有少数建于山内偏远的教堂幸免于难。这是一场教会和教堂建筑的浩劫。

* 教案的产生

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些启蒙的作用,如一部分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传播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①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1页。

② Chinese Recorder, Vol.64, 第433页。

③ J.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 1897年,第91页。

④ 杨鹤林,中国近代建筑复古之初探,华中建筑,1987年,第2期。

会的沉沦，西方传教士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把宗教作为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致使各类“教案”屡有发生。到十九世纪末，这种民教矛盾已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十分仇恨洋教，因而借用义和团打击天主教，这就使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骤然兴起，从而导致了庚子教案的产生。

山西地区义和团自1900年6月兴起，7、8月间进入高潮。运动区域大致分为五个地区：以太原府为中心的晋中各县，这是全省义和团活动的中心；以汾阳府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以潞安府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以平阳府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在运动中，山西北境教区，被杀主教2人，其它传教士22人，教徒3000余人，毁坏大小教堂近200座，其它建筑物甚多。在山西南境教区，义和团运动激烈的地方应属晋东南地区，被杀教徒1600余人，焚毁各处教堂房屋，教徒逃往他乡，人数顿减。^①

总之，山西义和团运动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波及范围却十分广泛，自省城太原到各府、州、县，义和团活动于东西南北各地，杀死传教信教者达几千人之众，教堂损毁破坏达3/4左右，这场运动教会称之为庚子教案。

* 教案的后果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总数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和计9.8亿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这项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山西每年支付116.3万两白银。同年签订了《山西教案合同》地方赔款条例，内容中确定山西付给天主教赔款达290万两，另外加上其他教会的赔款以及建学堂筹款总计近480万两。^②

如此巨大的赔款，再加上此时的山西发生大灾荒，使得当地人民困苦不堪，山西近代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而西方教会利用赔款，一方面大量新建教堂以及附属建筑，另一方面以赈济灾民的方式，大量拉拢人们入教，兼并土地，使教会成为有些地区最大的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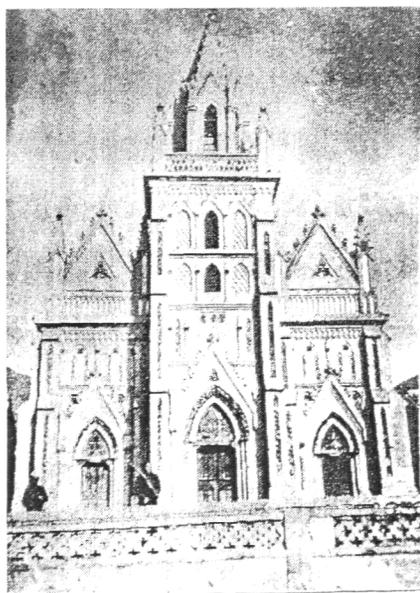


图 3-3 左云八台天主堂
Figure 3-3 Batai Church Built in 1914

① 乔志强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603~604页。

②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近代卷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277~287页。

力。

3.2.4 1900~1924 年天主教堂膨胀期

1900~1924 年的二十多年，教会史上将此称为“黄金时代”，因为在华各教会的传教事业的推进之迅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会虽然经历了庚子教案的严重挫折，但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一方面，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传教士们一如既往地沿海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地传播教义，设立据点，划分教区。另一方面，教会外部的社会环境则发生了迥异于 19 世纪的变化：其一，庚子教案以后，教会鉴于教案惨痛的教训，对自身的行径做出了一些反省和检讨，对传教士和教会在政治上的活动，做出了限制。因此，20 世纪以后各地因诉讼引起的民教冲突相对减少，教会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变。其二，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从法理上肯定了公民信教的自由。这是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无疑对促进传教事业有积极的作用。^①

这二十多年，山西天主教以城镇为中心向四周农村辐射发展，出现了全村信教的现象，像忻州大堡沟、武家庄。到 1925 年，教徒人数从 1900 年的一万多人增至四万人，教务兴盛。山西的教会建筑蓬勃发展，利用庚子赔款，不仅新建教堂，还有修道院、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资料显示，从 1902 年到 1910 年，山西北境教区主教凤朝瑞在职期间，兴建了太原主教座堂、总堂神父大楼、修女院大楼、若瑟医院、修道院和大小教堂 67 座。^②

根据笔者实地调研，北境教区现存的近代天主教堂大多数建于这二十多年，除太原主教座堂外，还有大同市主教座堂，左云八台天主堂（图 3-3）、朔州新安庄天主堂（图 3-4）等。由于义和团运动未能有效打击教会内部的西方势力，“仿欧式教堂”在山西依然大行其道。但是西方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一些当地传统的建筑符号开始很“小心翼翼的”出现在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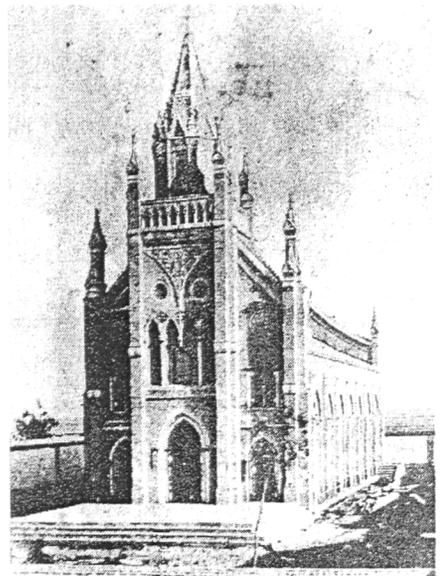


图 3-4 朔州新安庄天主堂
Figure 3-4 Xinanzhuang Church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51 页。

②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70 页。

堂建筑中。

3.3 本土化探索期的山西天主教堂

1924~1949年,山西天主教处于本土化探索期。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不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期。这期间出现了相关天主教的运动,一个是1922年至1927年,社会上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它缘起于知识界和政界,使用了在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传来的思想作为批判基督教的理论武器,非教会人士与教会人士在笔战中针锋相对,各抒己见。另一个是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以1924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为标志。“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天主教内出现了本土化倾向,与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教的本色运动一样,都是强调摆脱帝国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中国天主教开始大力推行本土化^②。当时,本土化的主要手段是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中式圣堂、中式圣艺及神学、礼仪的本土化等。

刚恒毅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2年,梵蒂冈派遣刚恒毅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各主教推动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刚恒毅一到中国,便发现中国艺术没有被教会所采用,认为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此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主张教会应采取中国艺术,刚恒毅极不欣赏在文化古都北平内所建造的主教大教堂,他称那是伪哥特式作品,与中国那些古色古香而又巍峨庄严的建筑相比,格格不入,形成强烈的对比。当然刚恒毅也不欣赏在中国任何地方所建造的西式教堂。为了实际推展中国建筑艺术,刚恒毅特地请了一位本笃会艺术家



图 3-5 大同县许堡村天主堂

Figure 3-5 Xubao Church

① 雷鸣远神父的名言之一。当时中国深受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榨;中国教会全国也无一位中国主教(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主教会议,四十九位在中国各地的主教中,只有二位“监牧”是中国人,一位是在会议前五个月任命的,另一位是在会议前一个月匆匆任命的),雷鸣远神父遂有感而发。其用意在于推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

葛来斯尼特 (A. Gresnigt) 神父来中国帮助他。葛神父到中国后, 先对中国建筑做研究工作, 等到确能领会中国艺术精神后, 刚恒毅便请他绘制了辅仁大学、香港总修院、开封总修院、安国主教大教堂, 以及宣化府主徒会总会院的蓝图。中国建筑艺术由此在教会内萌芽生根, 而且很快的蓬勃蔓延开来。^①

本土化运动真正影响到山西教堂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 这一时期的教堂沿袭着“仿欧式教堂”的脉络, 开始“很大胆的”融入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 并尝试着按照当地的生活习惯改进教堂的空间布局。但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时间短暂, 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 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 从而造就了特定时期的“中西合璧式教堂”, 如北境教区的大同县许堡天主堂 (图 3-5)、朔州上坡天主堂 (图 3-6) 等。

在战争期间, 教会建筑发展缓慢, 尤其是对抗日军的堂区, 个别教堂被焚毁, 神父被杀或逃离, 如忻州南高天主堂、左云八台天主堂均毁于战火^②。不过,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破坏的教区很快复原。整体看来, 天主教在这段时期虽然营造工作进展不大, 但教务发展一直持续, 有的地区, 基本未受到损失, 如德籍教士管辖的朔州教区、意籍教士管辖的太原教区等。

山西天主教不断收敛财富, 资产积累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资料显示, 在抗战结束时, 太原教区就经济实力而言, 位居全国各教区第二, 仅次于北京教区, 拥有银元 260 万, 在武汉有 13 栋楼房, 在天津有 28 栋楼房, 在太原有 30 多处出租房产和土地 3000 余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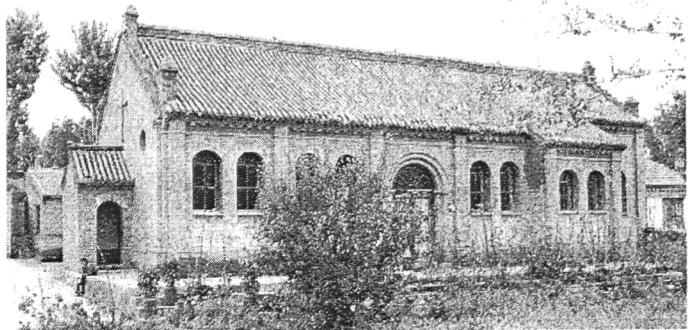


图 3-6 朔州上坡村天主堂
Figure 3-6 Zhongpo Church

每年房租、银行利息收入即达 21 万元。^③如此强大的财力支持, 使山西天主教的实力名列前茅, 因此这一时期兴建了大量的教堂, 如阳高张官屯天主堂、朔州南磨石天主堂、汾阳市主教座堂等。

① 顾卫民, 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世界宗教研究, 1996 年, 第 4 期, 第 99~100 页。

② 候愈荣, 天主教忻州教区历史概述, 内部资料, 1995 年, 第 72 页。

刘宏刚, 赵墟, 张鼎新, 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 大同, 内部资料, 2006 年, 第 39 页。

③ 李金华,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 第 420 页。

3.4 本土化成熟期的山西天主教堂

建国后，我国在建筑领域引进了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在山西大部分地区，教堂的本土化进程被打断。但在传统建筑文化底蕴深厚的局部地区，这一进程却仍在继续发展，并形成了成熟的“本土式教堂”——在保持教堂的空间和外型特征，即“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当地的生活习惯，使用传统的建筑符号和民间艺术对“教堂”这种外来的建筑语言重新作了诠释，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太原西柳林，是时代相传的匠人村落，村民们对传统建筑艺术充满热情，掌握着高超的建筑技术。在1992年，他们为本村自建的天主教堂，便是“本土式教堂”的典范（图3-7）。

由于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仅供参考，暂不作具体论述。

3.5 小结

近代山西天主教堂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它们随着社会环境、宗教环境、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

从社会环境来看，随着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天主教也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在山西，由于当地政府惧怕外国势力，不插手教会事务，所以，教徒、教堂数量增加很快。虽然在1900年，天主教遭到重创，但在此之后，地方政府再也不敢轻易与西方势力角力，天主教堂遂又遍地开花。

从宗教环境来看，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层出不穷。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观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受到西方国家保护的天主、基督教会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这在客观上为山西天主教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人们的思想来看，百年的近代历史，中国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上邦之国”



图 3-7 太原西柳林天主堂
Figure3-7 Xiliulin Church

① 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

的优越感逐渐消失。在近代初期，人们还不能接受西方宗教文化，但到了1900年之后，西方技术和物质的优越，使人们开始向往并且愿意了解这些外来的事物，人们思想的这种转变为教堂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从教会内部中外势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来看，教会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本土文化主导期、欧洲文化主导期、本土化探索期及本土化成熟期。这种势力格局对各个阶段教堂的风格、形式和规模等形成重要影响。

由上述因素可总结出近代山西天主教堂的整体概况：以1844、1924及1949年为划分点，可分为四大阶段。

教堂发展的初期阶段（1620~1844），包括教堂的发展期和衰退期。当时，天主教刚传入山西，西方传教士势单力薄，教堂受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表现为“庙宇式教堂”。

教堂发展的中期阶段（1844——1924），包括教堂的恢复期、扩张期及膨胀期。随着教会内部西方势力的不断强盛，教堂的建筑风格逐步被西方传教士的个人喜好所左右，“仿欧式教堂”布满山西。

教堂发展的后期阶段（1900——1949），即教堂的本土化探索期。在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推动下，山西的传统建筑文化在教堂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遂产生了特定时期的“中西合璧式教堂”。

教堂发展的晚期阶段（1949——至今），即教堂的本土化成熟期。解放后，在山西传统建筑文化底蕴深厚的局部地区，教堂的本土化进程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成熟的“本土式教堂”，极具地方特色。

总体来看，山西教堂的建筑风格经历了一个由“庙宇式”，突变到“仿欧式”，再过渡到“中西合璧式”，最终又回归到“本土式”的过程，此间同时伴随着教会内部中外籍传教士的权利斗争以及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民族斗争。教堂从被迫接受“庙宇式”到主动回归“本土式”的过程如实的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外来建筑文化从碰撞、到交叉并最终融合的过程。

第四章 山西北境教区各阶段天主教堂实例分析

山西北境教区成立之前,在此范围内已经有部分教堂建筑建成并保留下来,但数量稀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山西北境教区的教堂建筑大多是1900年以后兴建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新建的教堂超过了原有的总数,尤其是20世纪前二十多年教堂建筑蓬勃发展。但随后十几年的战争期间,教堂数量发展缓慢。解放后,在文革期间,教堂的钟塔大多被拆,记载文字的座碑被毁。存留至今的教堂大多修复过。值得庆幸是,鉴于教堂的神圣地位,修复后的教堂基本保留了原貌,为近代教堂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笔者认为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可分成四种不同的风格,即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为基础的“庙宇式教堂”;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的“仿欧式教堂”;兼具中西两种文化特点的“中西合璧式教堂”;以及最终发展成熟的“本土式教堂”。

4.1 本土文化主导期的初期教堂形式——“庙宇式教堂”

初期的山西天主教堂是以传统的北方建筑形式为基础的,由当地人自愿而建,建筑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较少。这是由于天主教刚刚进入山西,为了被人们所接受,不得不接受或运用本土形式。可惜初期的教堂实例留存很少,只能从个别教堂的残留部分以及史料记载大致分析它的形式。

4.1.1 唯一的现存实例分析——清初绛州天主堂

由于北境教区天主教传入较晚,因此,初期教堂的数量极少;再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动荡,使得这些教堂幸存至今的几乎没有。据目前所知,在北境尚没有发现初期教堂遗迹;而全山西也仅有一处,即清初绛州天主堂。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历史文献以及实地调研,发现北境教区初期教堂的建造情况与建筑形式,与南境相似相通,这一点在本文第三章已详细论证过。

因此,为了更直观的论证本文的观点,本章将以此为例。

* 天主堂的缘起

黄一农先生曾在《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一文中,对该天主堂做过论述:“天启七年(1627),绛州筹盖了全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

的天主堂，崇祯四年(1631)左右，绛州一地已有各式教堂三十座，清初，更拥有一处全国占地最广的天主堂^①，当地奉教的人口比例，甚至有可能是当时中国各传教区中最高者之一”^②。随后在文章的插图注解中，他又补充到：“韩霖兄弟曾於天启七年在绛州城东南购置两栋房屋，并改建成中国第一座由教徒在地方上捐建的教堂。”^③根据相关资料考证，此教堂就是明天启年间段袞^④在绛州段家庄所建的教堂，为中国古典建筑风格^⑤。

但在“入清后，此堂遭知州下令摧毁，在汤若望的施压下，地方官被迫以原明王府抵偿，遂修成当时中国境内占地最广的教堂”^⑥。此即名声在外的清初绛州天主堂。

* 天主堂的发展

在地方官被迫把原明王府抵偿给教会之后，教会做了简单的改造，如在屋顶上树立十字架等，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建筑的原有风格(图3-1)。

1724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教令，开始全面打压天主教。教堂不是被查封，就是被改作它用，有的甚至还被拆毁。绛州天主堂也未能幸免，被政府改建成东雍书院，祀奉孔子诸贤。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取消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要求清政府赔偿在禁教期间损失的教堂，以及索要被当地人改作它用的教会建筑。1861年(咸丰十一年)，法国教士梁多明面见山西巡抚英桂，要求偿还绛州的“东雍书院”，由于地方官绅反对，在年底，总理衙门照会拒绝，但法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坚决要求归还原址。在1863年(同治二年)，山西主教派教士张武良终于至绛州接受了东雍书院。^⑦

* 天主堂的建筑风格与价值

同其它清初天主教堂一样，绛州天主堂采用地道的当地传统建筑形式，是初期“庙宇式教堂”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久远、教案频发、以及近代战争的影响，同时期的其

① Fortunato Margiotti, *Il cattolicesi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 Roma, 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 1958年, 第106-110页。

② 黄一农, 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 第1~2页。

③ 同上, 第14页。

④ 段袞, 字九章, 圣名斯德望。在北京为官时奉教, 回家后勤其家人及亲戚朋友信奉圣教。他的女婿明王宗族灵邱王亦领洗事主, 且把自己的王府赠送给教会, 作为教堂。今天的绛州总堂即是灵邱王赠送教会的原址。

⑤ 段春生, 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 内部资料, 2005年。

⑥ 同②, 第14页。

⑦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 新绛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11月, 第613页。

它教堂均被毁坏，绛州天主堂成为唯一的遗存至今的初期天主教堂，是那个时期教堂形式的唯一见证，这越发显得它弥足珍贵。

4.1.2 特殊实例分析—忻州大堡沟天主堂

大堡沟天主堂建于 1897 年，从时间来看处于天主教的欧洲文化主导期。之所以把它归入“庙宇式教堂”，是因为它的建造背景以及建筑风格与本土文化主导期的完全相似，这是由于山西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

大堡沟位于忻州市城西南约 50 华里的一座山上，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也正因如此，才为本案教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堡沟是忻州地区最大的教友村，村民全部信仰天主教^①。教堂坐北朝南，是北方建筑最为普遍的朝向，同时正对着村内的主要道路。

“大堡沟天主堂是忻州较早修建的教堂之一。从现有遗迹看，1897 年以前就有聚会祈祷之所。”据村中老者反映，该祈祷所就是现教堂门前的西配房，并套有一深一浅两孔窑洞。（图 4-1）“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同司铎杨雅各伯任忻州本堂（1888~1900），历时三年，筹建新堂一座，名曰“圣母堂”。木泥两工分别由奇村周氏和太原疙潦沟韩氏担任，南梁李还顺监工。此堂为正亭房五间，带有两耳房，共 21 米长，约 6 米宽，前有庭檐，雕刻精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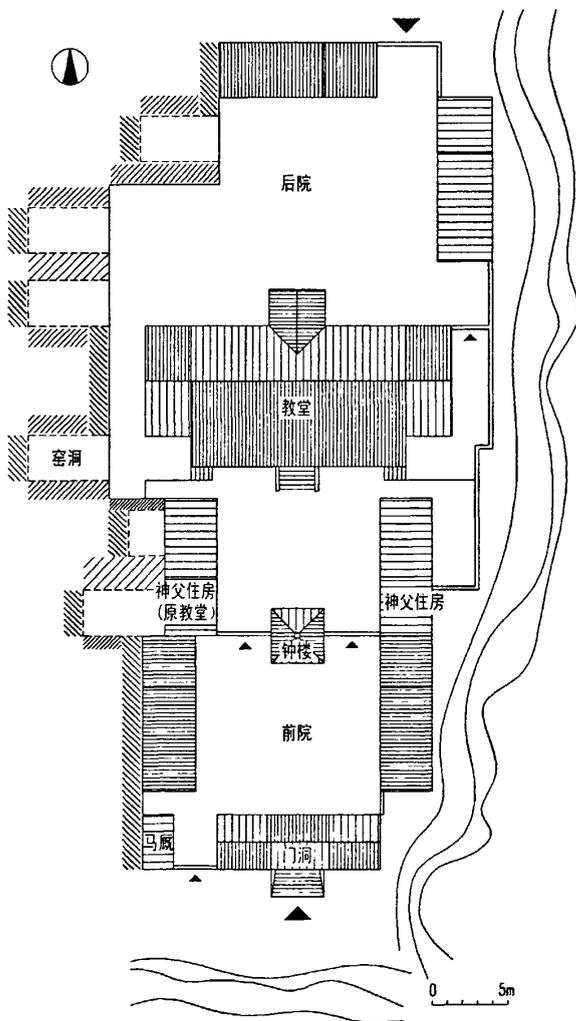


图 4-1 大堡沟天主堂总平面（想象复原图）

Figure4-1 Plan of Dabaogou Church

① 侯愈荣，天主教忻州教区历史概述，内部资料，1995 年，第 49~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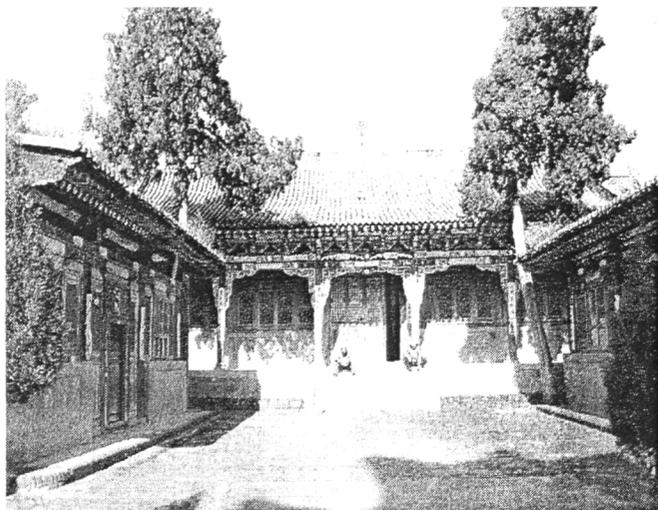


图 4-2 大堡沟天主堂

Figure4-2 Dabaogou Church

形式古雅，尽为我国古典样式（图 4-2）。圣殿前面配有东房、南房各三间，也为中国式样。殿院正中盖有高耸入云的钟楼一座，此钟楼于文革期间被拆毁。院南为大门并配有耳房（图 4-1）。大工告竣，尚未彩绘，恰逢义和团运动，杨铎殉道于大同。1901 年贾保禄继任忻州本堂（1901~1903），将清政府赔款彩饰大殿、钟楼、住房等。杜永青任职期间（1903~1908）

复加彩饰，雕梁画栋，栩栩如生”。^①

教堂不论外观还是平面都基本上按照当地传统的庙宇形制修建，并按照宗教生活习惯对建筑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如大厅、祭坛、小祭坛、神父准备室、乐队使用的夹层空间等。其中仅小祭坛的独立设置较有新意，但其直面入口的空间位置与当地传统庙宇神像的摆放方式又如出一辙（图 4-3）。正如当地人所说，“我们按修庙的方式修建教堂”。

大堡沟山高地远，受外界影响较小，该村天主教是清朝年间世代相传下来的。村中教堂是由大同籍神父筹资并主持修建，雇佣本地工匠，由本地人监工，修建而成，因此沿袭了当地传统的建筑特色。以当地庙宇的型制为基础，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以及礼仪习惯做局部调整，忠实的反映了当地人对天主教及天主教堂的认识和理解。这在西方传教士一手遮天的十九世纪末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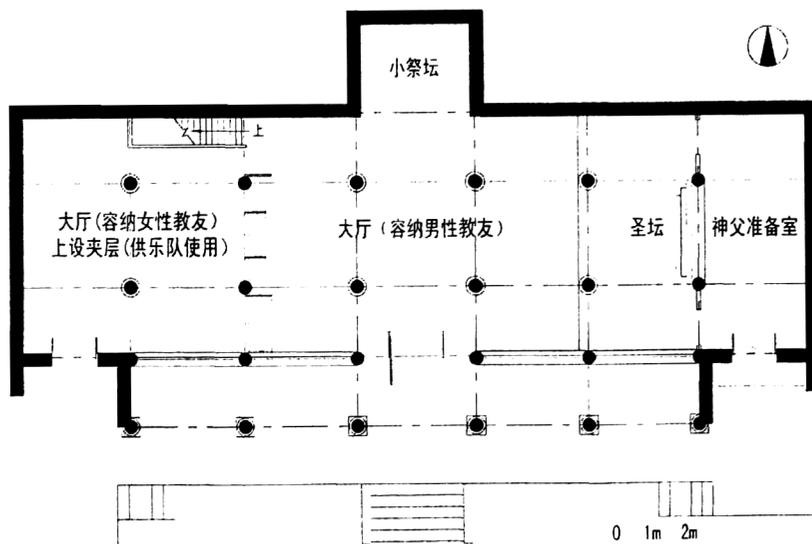


图 4-3 大堡沟教堂平面

Figure4-3 The Flat of Church

① 似愈荣，天主教忻州教区历史概述，内部资料，1995年，第50~51页。

4.2 欧洲文化主导期的中期教堂形式—“仿欧式教堂”

在山西近代教堂中，建于 1844~1924 年的教堂大多是仿照西方教堂的形式修建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混杂有少量的中式元素。北境教区的教堂大多模仿哥特式建筑风格，也许是这种风格更能体现天主教的宗教理念和宗教教义，高耸的钟塔则似乎展示着西方的强大。

4.2.1 1900 年前典型实例分析—阪寺山圣母堂

阪寺山圣母堂位于阳曲县东南侯村乡阪泉山上，距省城 40 公里。圣母堂建于 1895~1898 年间，是在艾士杰 (Mgr Gregorius Grassi) 主教的主持下，按照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由教内著名建筑师李有刚^①督工修建的。^②

教堂坐东朝西，与西方教堂的朝向一致。入口庭院、教堂以及神父住房成一轴线，但总体布局明显的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式。建筑平面在拉丁十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变动，于入口两侧增加了两个小侧翼，去掉了十字平面上较短的那一头 (图 4-4)。但总体上还是继承了西方教堂严肃规整的平面布局方式。

教堂立面采用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左右两个钟楼对称布置，相对于居中的局部二层的主立面并不显得高耸，而代之以一种协调端庄的美感。大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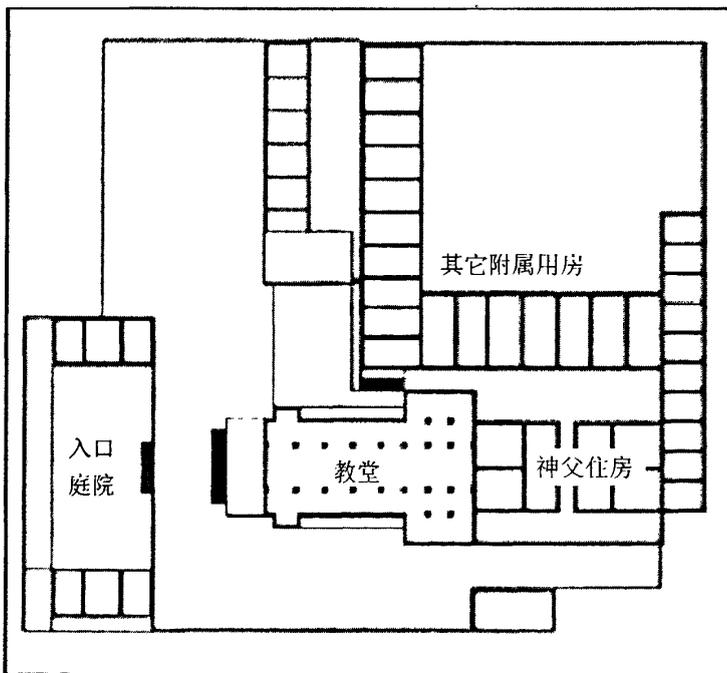


图 4-4 阪寺山圣母堂总平面
Figure 4-4 Plan of Bansishan Church

① 李有刚，潞安府人士，是天主教内著名的建筑师，生前修建了大量教堂，死后葬于阪寺山圣母堂后。

② 太原市阳曲县阪寺山圣母堂简介，堂内展板。

古典双柱式的运用是教堂主立面一个显著的特点，尤其是立面正中顶部的山花更是将这种西式风情发挥到极致。窗洞和门洞大量采用半圆券，值得一提的是主立面的三个门洞还用运了拱心石，这在北境教区的教堂中并不多见，是一种较领先的技术。曲线形的女儿墙在收头部位做了卷窝，是典型的巴洛克手法。顶部的一系列小尖塔大量见于山西的“仿欧式教堂”，表现了对于天国的向往，而十字架则象征着天主教的教义（图 4-5）。教堂主体采用坡屋顶，但屋面的檐口比较规整，并没有见到丰富多样的当地传统檐口做法。此外，教堂虽然大量的运用了浮雕，但是雕刻的内容却很少使用当地传统题材。



图 4-5 教堂立面

Figure4-5 The Facade of Church

1900 年前的山西天主教堂主要模仿西式教堂，由于西方传教士极度膨胀的民族优越感，当地传统建筑符号很难运用到教堂建筑中，即使在一些细部，如屋面檐口、浮雕等部位也很难见到，俨然一幅不可调和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庚子教案后有所收敛。

4.2.2 1900 年后典型实例分析—朔州市新安庄天主教堂

新安庄位于朔州城区往南约十里处，是朔州境内第一个天主教大堂口^①。本案教堂始建于 1879~1881 年、国籍神父常老楞佐任职期间；1900 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现存教堂是 1913 年由意大利籍任神父（P. Antoniu. Eippizone）主持，依地重建的，他认为这座圣堂将堪成为主教座堂^②。

教堂坐南朝北，位于在村口道路的尽端，使华丽的主立面在进村时远远的便能被看见。采用巴西利卡式平面（图 4-6），分为门洞、夹层、大厅、祭坛、及祭衣所五个部分；屋顶可划分为三部分，门洞之上耸立着高高的钟楼，大厅部分采用坡屋顶，由于层高关系、神父房的屋顶则较大厅为低。整个建筑长约 36 米、宽约 12 米、钟楼被拆之前总高 20 多米（图 3-4）。

① 韩铎民(P.Lodoricia.Here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 年，第 74 页。

② 同上，第 34 页。

教堂的建筑风格具有哥特式的基本特征。主立面正中的钟塔高高耸起，四周耸立着四个小尖塔，顶部立着十字架；两墙相交的四个拐角也各耸立着一个小尖塔，使教堂表现出强烈的向上升腾的动势。窗洞、门洞全部使用尖券，但是没有拱心石。其中窗洞的造型比较丰富，首先是一个大的尖券窗洞，券洞里墙皮内凹，并挖有两个小尖券窗架上一个圆形窗洞，并在窗洞外倚靠着三根罗马式柱，以上元素构成一个完整的窗。壁柱的大量使用是本教堂的另一个特点，不论室内还是室外，凡在与室内两列承重柱相对应的位置都可以见到(图 4-6)。立面上壁柱的造型也比较讲究，按照黄金分割分为上下两部分，并在交接处做了收头处理。壁柱与窗组合起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母题，运用到各个立面中，这成为本教堂的最大特色(图 4-7)。

本教堂的一些细部处理很有特色，如屋顶檐部、室内装修等。屋檐部分将椽头状砖饰点缀在欧式线脚之间，是当地传统建筑符号的运用。在室内，用四瓣半圆形木料外包砖柱，则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亲木情节”，同时也符合哥特式教堂的形式和功能要求。此外，用木结构制作柱头之间的连续券(在国外往往是用石块砌筑)，则使用了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

1900 年后的教堂依然是以西式风格为主，但在一些细部，如屋檐、室内装饰等，开始“小心翼翼”的使用一些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这是与 1900 年之前最大的不同。虽然这种变化很细小，态度上很低调，但是却反映了庚子教案后，教会中的欧洲势力不再盲目排斥当地的民间艺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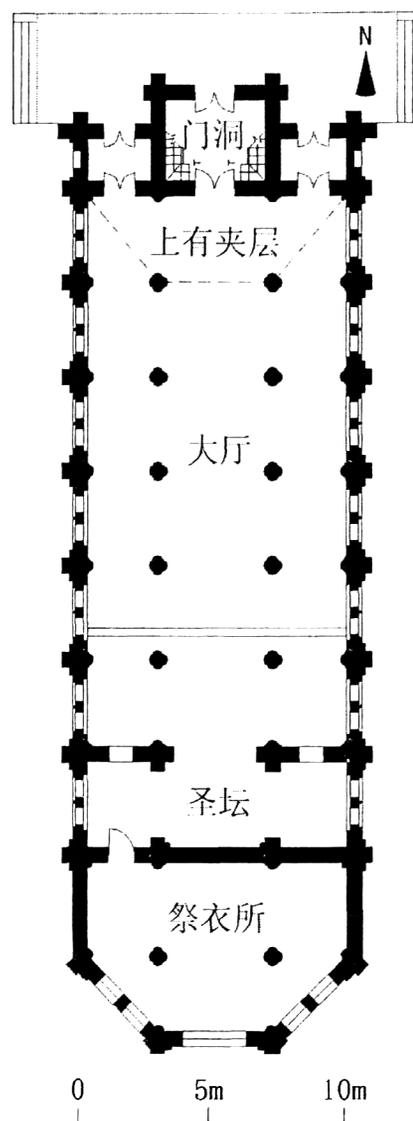


图 4-6 新安庄教堂平面
Figure4-6 The Flat of Church



图 4-7 教堂立面
Figure4-7 The Facade of Church

修建教堂的过程中，对于当地工匠的即兴发挥也不再强硬干预。当然这要归功于义和团运动对于西方传教士嚣张气焰的打击。

4.2.3 其它实例分析

4.2.3.1 左云八台天主堂

八台天主堂位于左云县三屯乡八台村，始建于1876年，由国籍神父张璞（老楞佐）主持，1900年被毁。现存教堂是1914年由意大利籍柏神父(Alexander. Piergili)重建的。^①

1946年内战开始，八台教堂遭到破坏，后被拆毁，现仅剩半截钟楼（图4-8）。根据遗留下来的老照片（图3-3），教堂坐北朝南，面向居民聚集区，属哥特式建筑风格，单钟塔，造型华美。

“八台位于距长城不远的龙王山脚下，离蒙古地区仅几步之遥，因此，对那些有必要逃亡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逃亡者中有不少是躲避教难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使该天主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地，目前，虽仅剩半截钟楼，但“每年8月2日，圣母剥俊古拉占礼（Portumcula），教友们，尤其是口外的教友们到此朝圣的，为数颇多。”^②

4.2.3.2 大同市西榆林天主堂

西榆林天主堂位于大同市南郊区西榆林村，始建于1896年，由意大利籍神父富格辣兴建，1900年被毁，现存教堂是1903年由敖殿臣神父重建的。^③

教堂坐西朝东，面向过往的主要道路，向南单侧开窗，但北侧留有窗洞装饰，形成了一种概念上的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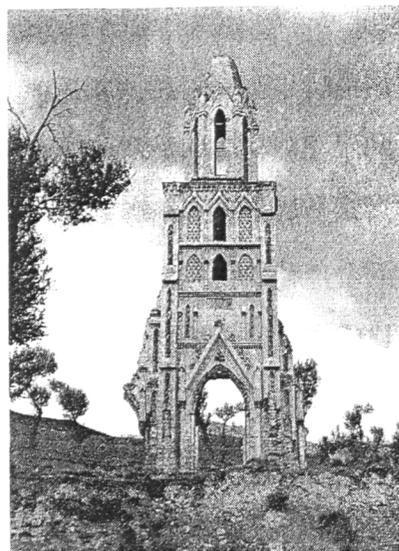


图 4-8 教堂钟楼
Figure4-8 The Belfry



图 4-9 西榆林天主堂
Figure4-9 Xiyulin Church

① 刘宏刚，赵墉，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39页。

② 韩铎民(P.Lodoricia.Here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年，第13~14页。

③ 刘宏刚，赵墉，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39页。

称。教堂长约 18 米、宽约 8 米，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减小了祭坛部位的面宽，并在祭坛北侧扩出一间，作为神父的祭衣所，大厅北入口加建了一个门斗，用来抵御风寒。

教堂建筑风格为以哥特式为主，单钟塔，混合有些许罗马风式建筑符号（图 4-9）。主立面正门没有运用尖券，而是罗马风式的半圆券。屋檐处重重叠叠，是典型的西式线脚做法。

4.2.3.3 大同市主教座堂

大同市都司街天主堂于 1889 年购地建堂，由李有刚负责按照意大利传教士绘制的蓝图监督施工，至 1891 年于艾士杰主教在任期间竣工。1900 年教堂被焚毁，现存教堂是 1906 年由敖殿臣神父依地重建的。

①

教堂坐北朝南，采用拉丁十字式平面（图 5-3），双钟塔，长约 24 米、宽约 15 米、钟塔高约 17 米。在钟塔处设夹层供乐队使用。

教堂具有罗马风式风格的一些基本元素，但相对轻巧（图 4-10）。古典柱式以及半圆券是教堂立面最主要的构图母题，入口处山花的使用是立面的亮点。而屋顶处镂空的女儿墙则有一些中国装饰风格。

4.2.3.4 朔州市沙垆河天主堂

沙垆河天主堂由意大利人出资，建于 1903 年。

教堂坐西朝东，面向过往主要道路，长约 25 米、宽约 12 米、文革前钟楼高约 25 米。规整的巴西利卡式平面，钟塔处设夹层供乐队使用。教堂风格很难确定，既有哥特式的尖券形式，又有罗马风式的厚重感，还体现着当地传统建筑的稳重与对



图 4-10 大同市主教座堂（文革前）

Figure4-10 Datong Church



图 4-11 沙垆河天主堂

Figure4-11 Shalenghe Church

① 刘宏刚，赵塘，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 年，第 37 页。

称，单钟塔。壁柱和尖券是立面上的主要构图元素，整体造型简洁大方（图 4-11）。

4.2.3.5 朔州市石碣峪天主堂

石碣峪天主堂由意大利人出资，建于 1920 年。

教堂坐西朝东，面向过往主要道路，单钟塔，长约 24 米、宽约 10 米。

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祭坛北侧扩出一间供乐队使用，神像背后扩出

一个半圆形空间作神父祭衣所。教堂采用多种建筑符号的混合样式（图 4-12），既有当地传统的檐部装饰和屋脊做法，又同时具备罗马风式的半圆券和哥特式的尖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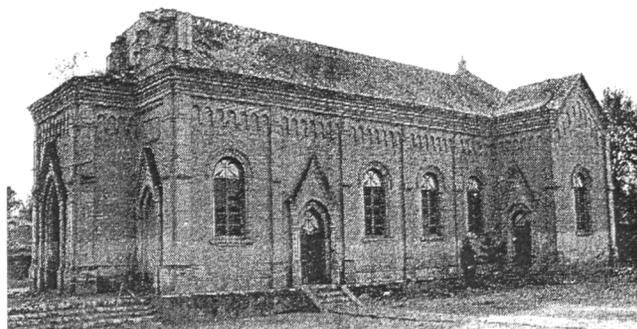


图 4-12 石碣峪天主堂

Figure4-12 Shijieyu Church

4.2.3.6 原平市墩阳镇天主堂

墩阳镇天主堂由意大利籍神父主持，建于 1924 年。

教堂坐东朝西，面向墩阳镇居民聚集区。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在祭坛背后加建有神父祭衣所，面宽较小于大厅。教堂具有哥特式的尖

券，还带有巴洛克的自由曲线，单钟塔（文革时被拆毁）。檐部使用了西式线脚做法（图 4-13）。然而入口处对联的位置和痕迹显示了浓厚的中国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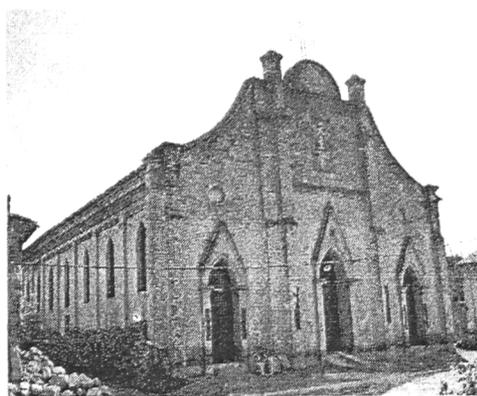


图 4-13 墩阳天主堂

Figure4-13 Dunyang Church

4.2.3.7 临县青塘天主堂

青塘天主堂始建于 1912 年，由国籍神父陈国砥主持；现存教堂是 1916 年由意大利籍神父富济才扩建的，也是北境教区唯一保存完整的教堂。^①

教堂坐北朝南，丁字形平面，单钟塔，长 30 米、宽 15 米、面积 500 多平方米、钟楼高约 32 米。祭坛位于西侧，南侧一端设有钟楼，为教堂主立面，东侧入口上方设有夹层。

① 崔成，汾阳教区史，内部资料，1996 年，第 38--40 页。

教堂风格具有哥特式的典型特征，同时混合有些许当地传统建筑符号，如屋脊线、檐部装饰、以及浮雕的内容等。工艺精美，气势宏伟。入口门洞在两侧逐层深入的券柱下显露出来，颇有神秘感（图 4-14）。

4.2.3.8 汾阳杨家庄天主堂

杨家庄天主堂建于 1910 年^①，坐北朝南，面向山下居民区，采用规整的巴西利卡式平面，钟塔独立设置。教堂采用哥特式的尖券窗，但主立面顶部三个一组的圆形装饰及四个一组的正方形装饰则表现出巴洛克风情。此外，建筑檐部的匾额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图 4-15）。这些奇妙组合给建筑带来一种特别的异域风格。



图 4-15 杨家庄天主堂
Figure4-15 Tangjiazhuang Church

4.2.3.9 太原市主教座堂

位于解放路 367 号，天主堂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庚子年（1900）被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主教凤朝瑞的主持下重建，占地约 13.3 万平方米，现存 4300 平方米。

教堂坐东朝西，面向主干道解放路；以拉丁十字式平面为基础，在入口一端增加了两个小侧翼，十字东端为半圆形；是一座罗马风式的高大建筑，通体铁红色，间以白线装饰。主建筑为礼拜堂，旁有两座西式尖顶钟楼（图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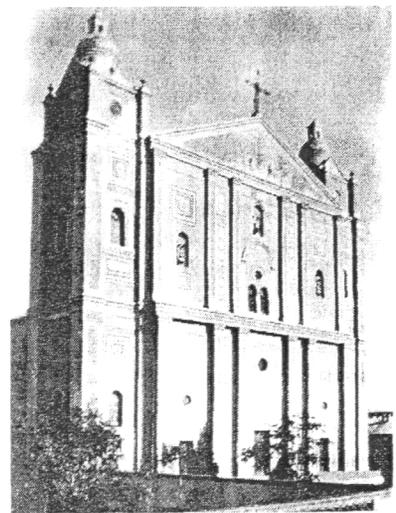


图 4-16 太原主教座堂
Figure4-16 Taiyuan Cathedral

4.2.3.10 阳泉河底天主堂

教堂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国籍神父胡宝善主持修建，包括大堂一座、二层楼一栋、修女院、学堂、办公室、客房共 30 余间，另设有保赤会，分前后两院，是

^① 崔成，汾阳教区史，内部资料，1996 年，第 3 页。

北境教区唯一保存较完好的建筑组群（图4-17）。^①

教堂坐西朝东，面向居民聚集区。采用规整的巴西利卡式平面，祭坛背后隔有神父祭衣所，钟塔独立设置。采



图 4-17 河底天主堂组群

Figure4-17 Hedi Church

用多种建筑符号的混合样式，既有哥特式的尖券，又有罗马风式的半圆券，同时檐部和女儿墙还采用了当地的传统建筑做法。

建筑群采用当地民间的合院式布局，前后两进院落以钟楼相隔；教堂位于第二进院落的中心位置，座落在高高的台基之上，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由此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4.3 本土化探索期的后期教堂形式——“中西合璧式教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天主教开始推行本土化运动，提倡教堂形式应更多的反映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刚恒毅（Costantini）主张：“既不要完全中国式的建筑也不要西方式的建筑。”教士格里森（Gresnigt）认为“所有的建筑形式都存在着互相适应的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中国寺庙和塔的形式，采用中国建筑形式的目的，是想用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式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中国的美学观念。^②”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堂的形式出现了探索性的变化。在山西，有的教堂由中国教徒自己设计，一般都受过像北京辅仁大学等教会学府的培养。这些教堂并不是简单的在西方形式上加加减减、局部添以中国建筑元素，而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教堂的有机组合，是以宗教要求为基础进行设计创造，它是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特殊产物。

4.3.1 重点实例分析一大同县许堡天主堂

许堡天主堂位于大同县许堡乡许堡村，于1931年由比利时籍神父田种德主持兴建^③。

① 河底天主教简史，内部资料，第2页。

② 格里森（Gresnigt），中国的建筑艺术，董黎（译），华中建筑，1997年，04期，第127页。

③ 刘宏刚，赵瑞，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38页。

文革期间钟楼被拆毁，其余部位保存完好。

教堂坐北朝南，单侧开窗，东西向较长，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祭坛处缩小了宽度，并在其背后加建一间，作为神父祭衣所（图 4-18）。与前期教堂相比，平面布局上有以下三处变化值得关注：

一，打破了祭坛一定面向主入口的惯性思维。教堂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选择了南向开窗，南向开门。为了得到更好的采光效果，缩小了教堂进深，从而导致祭坛与大厅只能横向布置。祭坛所对应的东面山墙并没有布置入口，照顾了建筑功能上的保暖要求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从而打破了祭坛一定面向主入口的惯性思维。

二，打破了严肃规整的对称格局。教堂的祭坛及祭衣所根据实际使用要求，宽度窄于大厅，是在巴西利卡平面形式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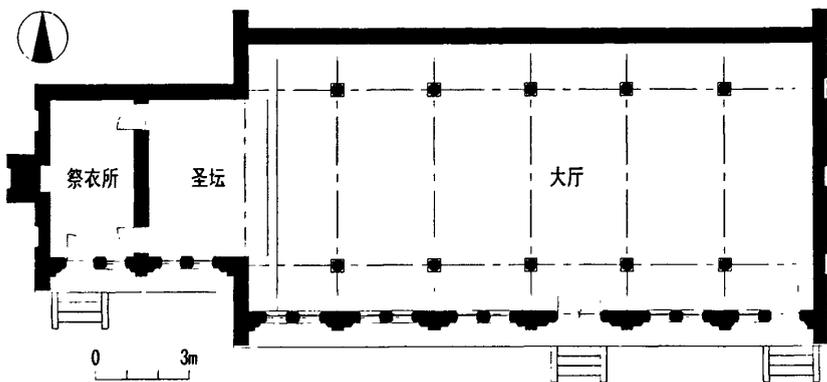


图 4-18 许堡村教堂平面
Figure4-18 The Flat of Church

一种改进。同时南向开窗，北向不开窗，并且也没作相应的窗洞装饰，说明使用者已经转变了审美观念，不再恪守古板的对称原则，而接受了实效性更强、更为灵活变通的平面布局方式。

三，弱化了钟塔的图腾作用。钟塔不再“一定”是建筑表现的首要元素，其所在的立面也不再“一定”是主立面。根据当地的传统建筑文化，由于钟塔所在的山墙不是建筑表现的重点，因此主入口所在的南立面取而代之成为教堂表现的重点。

教堂同时采用了罗马风式和中国传统式两种建筑符号，单钟塔（图 3-5）。南立面主要以罗马风式的半圆券和壁柱作为装饰母题。中国式的传统建筑符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木结构屋顶的结构和形式之美得到肯定（图 4-19-1）。屋檐出挑，以椽头、飞椽、以及猫头滴水的瓦口做法作为檐部的主要装饰手段。用优美的屋脊线强调屋顶轮廓，而且还运用了传统的吻兽做法。同时在建筑的山墙面使用了排山沟滴的瓦口装饰手段。

二，教堂山墙面使用了当地传统的马头墙做法。马头墙做法在北方民居中应用相当广泛，许堡教堂成功的移植了这种民间做法。

三，当地的民间题材成为教堂细部装饰的表现内容。如屋脊上的浮雕以当地传统的龙凤以及荷花作为主题。

四，强化了台基的装饰作用（图 4-19-2）。台基与教堂主体比例协调，台阶形式优美、做法考究，并且在面层使用了与屋顶同色调的青石作为装饰，强调了台基的轮廓线。

五，教堂山墙面使用了当地传统的挖凹龕做法、以及传统的砖檐做法作为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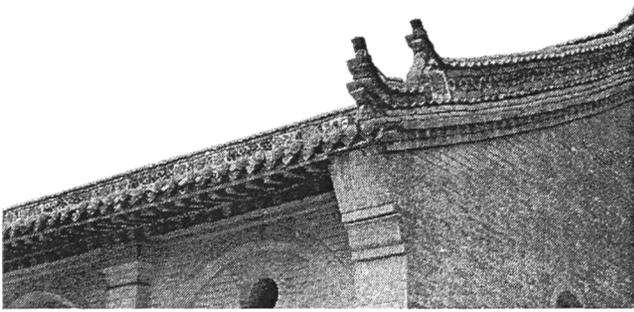


图 4-19-1 许堡村教堂屋顶
Figure4-19-1 The Roof of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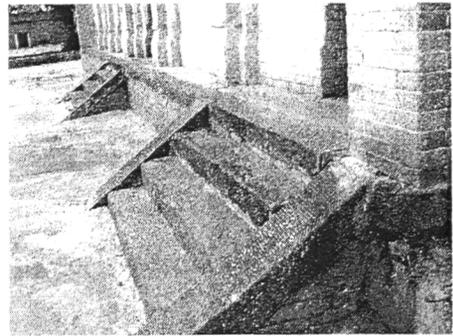


图 4-19-2 许堡村教堂台基
Figure4-19-2 The Boule of Church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天主教堂在本土化的道路上作出了种种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会开始接受并迎合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认可当地的民间艺术。当地工匠在使用传统建筑符号时，也不再“小心翼翼”，而是酣畅淋漓的“尽情发挥”。于是在三晋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中西合璧式教堂”。同时，由于山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在各地教堂中出现的有早有晚，并不同步。

4.3.2 其它实例分析

4.3.2.1 阳高张官屯天主堂

教堂位于阳高县下深井乡张官屯村，1934年由比利时籍神父田种德主持兴建^①。2003年曾重修屋顶。

该堂和许堡天主堂系同一神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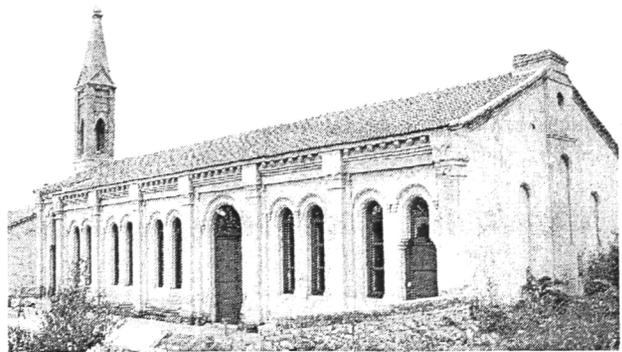


图 4-20 张官屯天主堂
Figure4-20 Zhangguantun Church

① 刘宏刚，赵埔，张鼎新，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内部资料，2006年，第38页。

持修建，不论建筑平面布局还是外观造型均和后者非常相似。木结构屋檐没有出挑，而是用了传统的砖檐做法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图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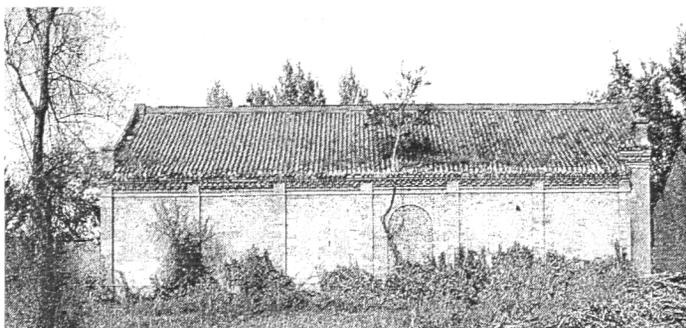


图 4-21 南磨石天主堂
Figure4-21 Nanmoshi Church

4.3.2.2 朔州南磨石天主堂

教堂于 1940 年^①，由德籍神父桂万才^②主持修建。

教堂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东西向较长，祭坛位于东向，正对西向的次入口，无钟塔；南立面单侧采光并布置主入口，为教堂主立面，尤其是主入口修饰精美，取代了钟楼的图腾作用；北立面无窗洞装饰；缩短了祭坛面宽，并在其北侧加建一间作为神父祭衣所。

教堂的窗洞和门洞采用了罗马风式的半圆券，可惜门洞装饰在文革中被毁，无法一睹其昔日风貌。其余部位大量采用了当地传统建筑做法，颇似民居（图 4-21）。

4.3.2.3 朔州上坡天主堂

教堂于 1939 年^③，由德籍神父桂万才主持修建。

教堂以拉丁十字式平面为基础，东西向较长，祭坛位于东向，正对西向的次入口，该次入口还加建有门斗；缩短了祭坛面宽，在祭坛与北侧翼之间加建了神父祭衣所；南侧翼进深很小，仅是概念上的一个侧翼；单钟塔，位于西侧山墙之上；南立面单侧采光并布置主入口，为教堂主立面，北立面无窗洞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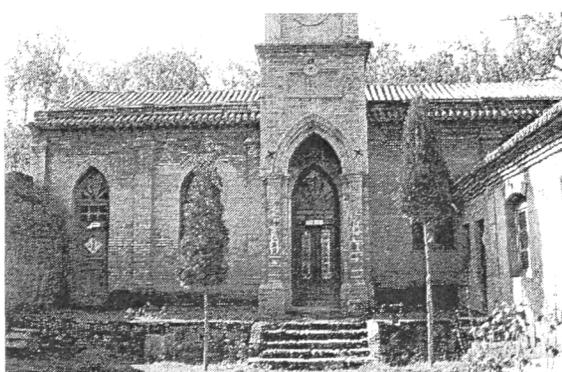


图 4-22 地黄梁天主堂
Figure4-22 Dihuangliang Church

① 韩铎民(P.Lodoric.Hercrich)，朔县教区简史，李树洙（译），内部资料，1963 年，第 64 页。

② 杜万才，德国籍方济格会修士，是一个天才的建筑家，又擅砖木工、绘画、雕刻。1927 年，朔县教区成立了一个由他负责的木匠作坊，在周边地区兴建了很多教会建筑，其中便包括南磨石、东榆林、以及上坡村的天主堂。

③ 同①，第 94 页。

教堂采用了罗马风式的半圆券，钟塔文革时被拆毁，其余部位主要运用了当地传统建筑做法，具有浓厚的本土风味（图 3-6）。

4.3.2.4 忻州地黄梁天主堂

教堂于 1934 年，在国籍神父邢化民任本堂时建成，合院式布局。^①

教堂坐西朝东，南北向较长；以巴西利卡式平面为基础，在东侧主入口处加建有门斗，钟塔就耸立在门斗之上；祭坛位于北侧，南侧无入口；东立面单侧采光，为教堂主立面，西立面无窗洞装饰。

教堂的窗洞和门洞采用了哥特式的尖券，钟塔文革时被拆毁，在其它部位大量运用了当地传统的民居做法，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图 4-22）。



图 4-23 武家庄天主堂
Figure4-23 Wujiazhuang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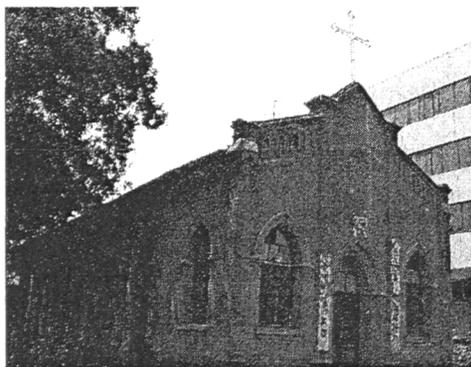


图 4-24 博爱里天主堂
Figure4-24 Boaili Church

4.3.2.5 忻州武家庄天主堂

教堂始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并有钟楼，现存教堂是 1932 年由意大利籍神父赵瑞璋改建而成的。^②

教堂坐南朝北，面向村民聚居区。采用规整的巴西利卡式平面，入口处设有夹层。以哥特式风格为主，局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作为装饰，如檐部的斗拱状砖饰。此外教堂主立面的左右两个窗洞很有特点，比较少见（图 4-23）。

4.3.2.6 榆次市博爱里天主堂

教堂于 1938 年^③，由意大利籍神父主持修建。

教堂坐西朝东，以拉丁十字式平面为基础，去掉了十



图 4-25 汾阳主教座堂
Figure4-25 Fenyang Cathedral

① 俞愈荣，天主教忻州教区历史概述，内部资料，1995 年，第 59 页。

② 同上，第 53~54 页。

③ 天主教榆次教区沿革，内部资料，第 13 页。

字较短的一端，出入口开设较多。以哥特式风格为主，局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作为装饰，如檐部的斗拱状及垂花状砖饰，具有较强的本土化特征（图 4-24）。

4.3.2.7 汾阳主教座堂

教堂于 1933 年，由国籍神父刘锦文主持修建。^①

教堂坐北朝南，无钟楼，以拉丁十字式平面为基础，增加了 3 组侧翼，有效的抵消了屋顶的侧推力，缩短了祭坛处的面宽，并在其东侧加建了一间作为神父祭衣所（两层）。

教堂以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主，同时大量使用了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如中国式的屋顶做法和檐部装修，传统的格椽窗，以民间题材为内容的浮雕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图 4-25）。

4.4 本土化成熟期的晚期教堂形式——“本土式教堂”

建国后，在山西一些传统建筑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出现了发展成熟“本土式教堂”。如太原西柳林天主堂，教堂坐北朝南，沿用了典型的拉丁十字式平面，三钟塔。教堂的空间布局和体型延续了既往的特点，但细部处理却完全以中式手法为主，如中式门斗、中式亭楼、中式台基等；只有窗洞的半圆券造型、及逐层深入的处理手法，才能反映出些许欧式痕迹。本教堂表达的是天主教教义，但表现的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图 3-7）。

由于该部分内容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仅供参考，因此不作详细论述。

4.5 小结

山西教堂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建筑风格演变出四种不同形式，但无论是初期的“庙宇式教堂”、中期的“仿欧式教堂”、后期的“中西合璧式教堂”、还是晚期的“本土式教堂”，贯穿始终的总体特征就是不同程度上的中西交融、合璧合成。

早期的天主教，一般使用当地教徒捐献的房屋作为活动场所，随后在此基础上，改建或新建教堂，施工者与资金来源大多为当地教徒。教堂形式、建造技术、内部装饰等遵循当地传统式样，适当结合天主教义，对建筑空间进行改造。表现出天主教的空间型制与当地传统建筑造型相结合的结果。

^① 崔成，汾阳教区史—内部资料，1996 年，第 10 页。

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的教堂建筑，是山西北境教区采用最多的一种形式。传教士照搬或模仿哥特、罗马风、巴洛克的教堂模式，受当时西方折衷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教堂多以风格混杂的形式出现，以西式构图及造型为主，在局部构件或细部处理上，“小心翼翼”的点缀一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表现出以西式风格为主，适当点缀中式符号的“仿欧式”风格。

“中西合璧式教堂”的出现，要归功于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由于教会开始接受并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认可当地的民间艺术，所以北境教区的后期教堂，较多的使用了当地的传统建筑符号，反映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体现了天主教教义和西式教堂中国化的探索过程。

“本土式教堂”于建国后，在山西局部地区出现，它摆脱了西式建筑符号的桎梏，而代之以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来表达宗教教义，是发展成熟的本土化形式。

上述四种不同的教堂风格的出现，反映了各阶段不同程度的中西交融：“庙宇式教堂”是对当地建筑形式的被迫接受；“仿欧式教堂”是对西式教堂形式的强行推广；而“中西合璧式教堂”则是对当地风土民情的主动适应，并最终发展出成熟的“本土式教堂”。教堂风格的不断演变，归根结底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在建筑上的反映。

第五章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总结

建筑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建筑的总体形象上，而“建筑形象常常是通过建筑环境的布局、建筑群体的组合、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以及建筑材料所表现的色彩、材质、光影等多方面的处理，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艺术”^①。北境教区天主教堂在上述各要素的处理上独具特色，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5.1 欧洲天主教堂的宗教含义

从遗留下来的北境天主教堂来看，影响北境教堂风格的主要有罗马风式和哥特式，还出现过巴洛克典型的装饰纹样，这些建筑风格在重新解读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参与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难免会出现歧义。因此，如果想真正了解教堂的建筑风格和场所精神，必须从北境天主教堂的源头，将教堂宗教含义的产生过程还原出来。

欧洲天主教堂的平面和空间与其宗教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教堂的每一部分都有具体的宗教寓意。整座教堂象征天国，初期教会教父奥利振把教堂比作诺厄的方舟^②，安全、栖息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圣堂大厅中间部分、中堂的名称 nave 解释。Nave 一词源自拉丁文 navis，意指“船”。教堂西向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耶路撒冷，教堂四面墙壁以及建筑的四方石块，代表天主教义倡导的四大美德——勇、义、智、节，教堂穹顶的十字交叉结构正是十字架的象征。还有一些宗教意义可能是教徒出于宗教的狂热增添到教堂象征意义中，例如从平面解释，殿堂是耶稣的躯体，祭坛是耶稣的头部，若祭坛略偏轴线代表十字架上殉难者基督下倾的头，祭坛两侧的忏悔室是耶稣被钉的双臂。甚至教堂建筑的主要材料——石块也被认为是象征信仰的坚定性，豁结全部材料的石灰体现信徒炽热的爱意，掺和用的水代表起联接作用的精神力量。

天主教传教士出于宗教信仰，对北境教堂提出某些基本的、符合教义的要求，诸如采用西方教堂的内部空间形式，根据宗教含义决定教堂平面等。这些宗教文化的要求影响北境天主教堂的形成。

① 李允稣，《华夏总匠》，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② 赵一舟神父，详见月刊《见证》，2003年1月份，第16页。

5.2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的“三要素”

大厅、祭坛、以及起图腾作用的主立面是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三要素”。北境教堂的规模大小不一，平面形式丰富多样，建筑风格兼收并蓄，具有非典型性的特征。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教堂蕴含着诸多构成元素，如大厅、祭坛、祭衣所、侧翼、夹层等室内空间，以及华丽的主立面、高耸的钟楼等室外造型。在这诸多构成元素中，有些元素根据具体情况可多可少，有些则是教堂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型教堂的调研发现，大厅、祭坛、以及起图腾作用的主立面是天主教堂的三个必备要素。即使一个最简单的小型教堂，也不能省略这最基本的“三要素”。

大厅是教徒们跪拜祈祷的空间，满足教徒最起码的使用要求。在北境教区，一些规模较大的教堂，大厅内往往会使用两列承重柱来满足跨度要求，如朔州新安庄天主堂等；也有个别小型教堂，大厅内不设柱，如忻州地黄梁天主堂等。此外，有的教堂还特意将大厅划分为前后两部分，供男女教徒分别使用，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

祭坛是放置神像、供神父宣扬教义的空间，是教徒们精神寄托之所在。在北境教区，大部分教堂只设一座祭坛，如大同县许堡天主堂等；还有少数教堂同时设置两座或多座祭坛，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汾阳市主教座堂等。

华丽的主立面象征着教堂所代表的天国的美好，寄托着教徒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图腾崇拜作用。钟楼在传统的西式教堂中往往是建筑表现的重点，传入中国后，受到当地宗教“钟庙分离”的影响，图腾作用被弱化，有些教堂甚至不带钟楼，而将钟楼单独设置，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汾阳杨家庄天主堂等。这样布置有出入口的主立面，就成了首要的图腾符号。

5.3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基本特点

5.3.1 建筑组群的总体布局

天主教传入北境教区初期，为了迎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宗教活动往往在富有教民的住宅内进行或是直接购买民居作为教堂，导致以后教堂建筑格局多是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在随后的天主教发展过程中，因为合院建筑提供的空间能适应天主教堂的各种功能，建筑前后的大小庭院可以满足各种宗教活动，所以合院式格局成为北境教区天主

教堂的较早形态。

北境教区的合院住宅充分反映传统家庭制度，建筑群有明显的轴线，经堂等最重要的建筑配置在中心线的主轴上，附属房屋排列在两侧。教堂建筑借用传统布局原则，划分教会的尊卑，重视中轴线，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单体建筑随使用功能改变和观念变迁而发生了变化，以耶稣取代了原来格局中祖先的位置，从祖屋、厅堂变为教堂，其他附属建筑对称布置。

北境教区教堂的平面布局一般比较简单，除礼堂采用欧式教堂制式外，其他附属建筑的组群配合完全依照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原则，但是外来的宗教教义和文化也会改变传统的空间布局，总平面布局并不遵守完全固定的格局，而是比较灵活处理建筑关系，形成特有的地方教堂建筑群平面。根据经堂在总平面所处位置，合院式格局大致分以下两种形式：

(1) 教堂位于建筑群的中心轴线上

天主教堂位于院落的中轴线上，主教及神父住宅在教堂的两侧或是院落的后半部分。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图 4-1），阳泉河底天主堂（图 4-17）。

(2) 教堂位于建筑群的一侧

教堂位于院落一侧，附属用房集中放在另外一侧，像阪寺山圣母堂（图 4-4），汾阳杨家庄天主堂等。

在西方，教堂建筑多为东西向布局，大门朝西，以西立面为主立面，祭坛位于东方，即耶稣基督圣墓的所在。当教徒在中殿祭坛之前拜祭时，可以见到东升的太阳在后堂透过巨大的窗户投入教堂的阳光——上帝之光（图 5-1）。但山西的当地教徒并不能充分认识这种布局的含义，而是根据自身的生活习惯，或者将主立面朝南，符合当地传统观念，如临县青塘天主堂、朔州上坡天主堂等；或者将主立面朝向过往主要道路、居民聚集区，方便教徒朝拜，如朔州石碣峪天主堂、阳泉河底天主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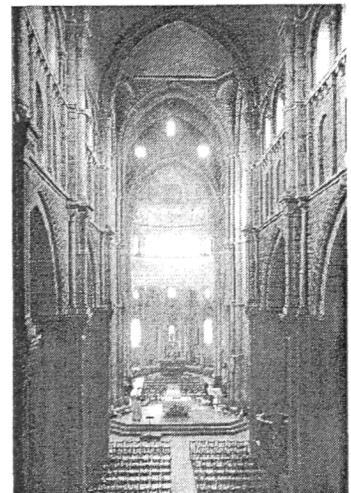


图 5-1 西方教堂的内部
Figure 5-1 Interior of The Western Church

5.3.2 外部形体

建筑空间的外部构件中，垂直限定空间的墙壁与水平划分空间的屋顶直接反映建筑的外部形象，其使用的结构体系影响外部形体的变化。

* 屋顶形式

发展成熟的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把屋顶放在建筑的首要位置，屋顶的功能不仅是遮挡和防护，而更多的是代表建筑的地位、等级，由此来表现拥有建筑的人的尊卑等级。西方教堂建筑则正好相反，尽可能降低屋顶在造型中的重要性，用延伸墙面和柱式的方式淡化屋顶的造型。山西天主教堂在引入西式教堂的过程中，延续了中国式屋顶形式，用于教堂正立面的后部主体部分，到本土化运动时期，则直接把屋顶形式表现在正立面上。

教堂主体的屋顶随长方形中厅的形式而采用两坡顶（图 5-2-1），后部突出的圣殿采用类似攒尖顶（图 5-2-2），与中厅屋顶不在同一平面，教堂若有侧廊，使用单面斜坡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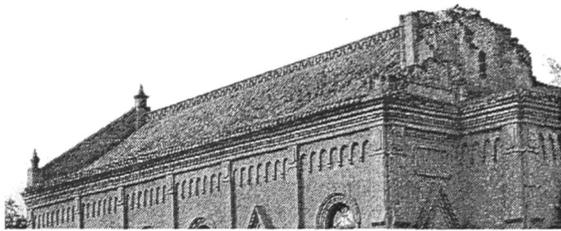


图 5-2-1 屋顶形式一

Figure 5-2-1 The Roof Form of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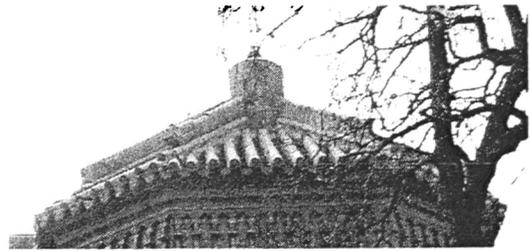


图 5-2-2 屋顶形式二

Figure 5-2-2 The Roof Form of Church

盖，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屋顶形式，将建筑的使用功能通过屋顶形式与外观造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大多数教堂的屋顶檐口出挑浅，为了能达到檐口与墙体的良好结合，不使教堂显得突兀，一种做法就是采用多层线脚作为过渡（图 5-3-1），这与西方教堂的处理方法一样，但这种做法会使檐口感觉很厚重，所以，不同体形的教堂，线脚与檐口的比例不同，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山西教堂不乏优秀的实例；另一种做法就是在出挑的檐口下部使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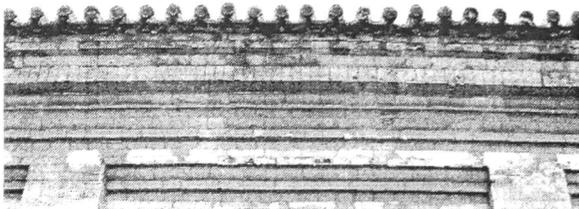


图 5-3-1 屋顶檐口一

Figure 5-3-1 The Eaves' 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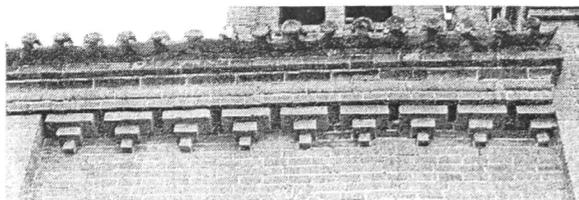


图 5-3-2 屋顶檐口二

Figure 5-3-2 The Eaves' 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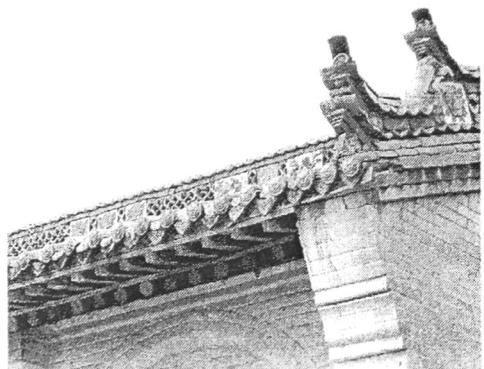


图 5-3-3 屋顶檐口三

Figure 5-3-3 The Eaves' Form

似传统木结构装饰构件的砖饰，如斗拱、椽头等（图 5-3-2），增强了教堂的中式气质。在本土化探索期，还有的教堂则直接将木结构屋檐出挑（图 5-3-3），把中国传统的木结构艺术嫁接到教堂之中。

*** 立面造型**

建筑的外部形象要通过墙面材料的形状、尺寸、质感、色彩、局部装饰等共同合成。山西天主教堂大体仿照了西方建筑的墙体形态，但在合成元素上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于西方教堂的

视觉感受。大多教堂的墙体被壁柱竖向划分（图 5-4-1），分成均匀的开间，墙体上顺序开窗，窗户大小根据墙体受



图 5-4-1 外墙形式一
Figure5-4-1The Wall's Form

力情况而定，墙

体底部做抹灰，起装饰兼防水的作用。有的教堂墙体除此之外还被水平划分（图 5-4-2），以窗沿线或腰线划分为上下二段。另外，墙体外突的小空间也为整个墙体形象增色不少。



图 5-4-2 外墙形式二
Figure5-4-2The Wall's Form

教堂的墙体材料一般是青砖，裸露的面砖保持本色，不做色彩处理。为了仿照西式的圆弧造型，按照砖的位置烧制了弧形、半圆形青砖，充分发挥了烧制工艺的优势，这些砖砌成外觀光滑弧形墙，圆形壁柱，砖与砖之间灰浆粘合，严丝合缝，线条流畅，即使壁柱上的细小的线脚也层次清晰，显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艺。



图 5-5-1 立面顶部形式一
Figure5-5-1The Top Form of Church'sFacade



图 5-5-2 立面顶部形式二
Figure5-5-2The Top Form of Church'sFacade

教堂的立面形式融合了西式教堂与当地传统建筑的风格，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融

合方式，通过教堂立面构图的比例和各种建筑元素的组合方式表现出来。

山西教堂中有一部分较忠实的遵循了西式教堂立面的基本构图方式：立面竖向分成三段，横向分成三层或二层，突出中心部分，底层设三扇尖券或圆券门，表示“三位一体”的天主，上有圆形花窗，顶部置十字架，两侧建造对称的钟塔。大多教堂的立面经过当地工匠的继承与创新，结合既有的传统元素与外来形式，摸索出两者的融合方式，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堂立面造型。其一，立面顶部的处理。西方教堂的正立面一般以尖顶结束，而中国人习惯水平线的构图，为了缓解教堂向上的动势，采用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手法：直接用水平展开的装饰性女儿墙收头（图 5-5-1）；把三角山墙的尖部处理为圆滑的弧线（图 5-5-2），弱化尖角的矛盾。其二，利用中国文化装饰。西方教堂一般

使用人物形态雕塑丰富立面，传达宗教文化，而山西教堂吸收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匾、楹联作为装饰，通过文字表意。其三，钟楼造型的处理。钟楼在西方教堂建筑中有重要地位，是为纪念圣母玛利亚诞生耶稣而建的。山西天主教堂大多把钟楼放在主立面，左右对称放置或正中设置，以西式风格为主（图 5-6-1）；而有的钟楼则类似于中国的小亭（图 5-6-2），独立设置在教堂正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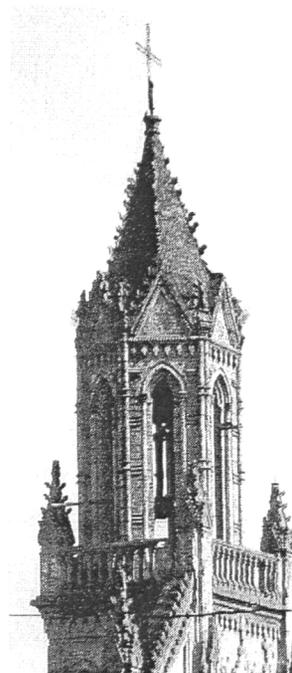


图 5-6-1 西式钟楼

Figure5-6-1

The Western Belf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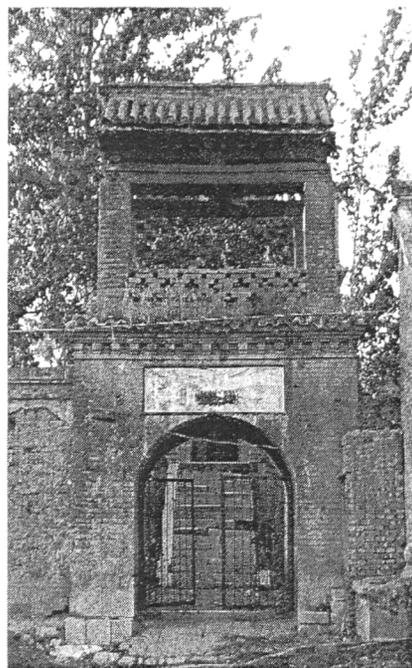


图 5-6-2 中式钟楼

Figure5-6-2

The Belfry of The Chinese Style

山西教堂的基础是重要的造型要素。在西方，基础是隐蔽不露或不引人注意的，而在山西，基础是重点要素，一些规模较大的教堂都会用带多层台阶的平台突出基础的造型功能，如大同市区天主堂，台阶两侧还设置有镂空的砖砌围栏，很有地方特色。

5.3.3 平面形式

山西天主教堂的平面形式主要是“巴西利卡”矩形和拉丁十字，以及由这两种形式演变而来的各种变形。

“巴西利卡”是一种长方形的教堂平面形式。其特点在于主体建筑为一长方形大厅，大厅被两排柱子纵向划分为一个中厅和左右的侧廊，中厅比侧廊宽，而且更高。教徒把厅称为舱，因为基督教宣扬信徒们要同舟共济、互相关爱。中厅是教徒做礼拜的地方。中厅末端为半圆形圣殿，圣殿上部为拱形圆顶，两侧有忏悔室、告解室等。祭坛设于圣殿前沿。教堂主入口设在正对圣殿的山墙面，门前有一个露天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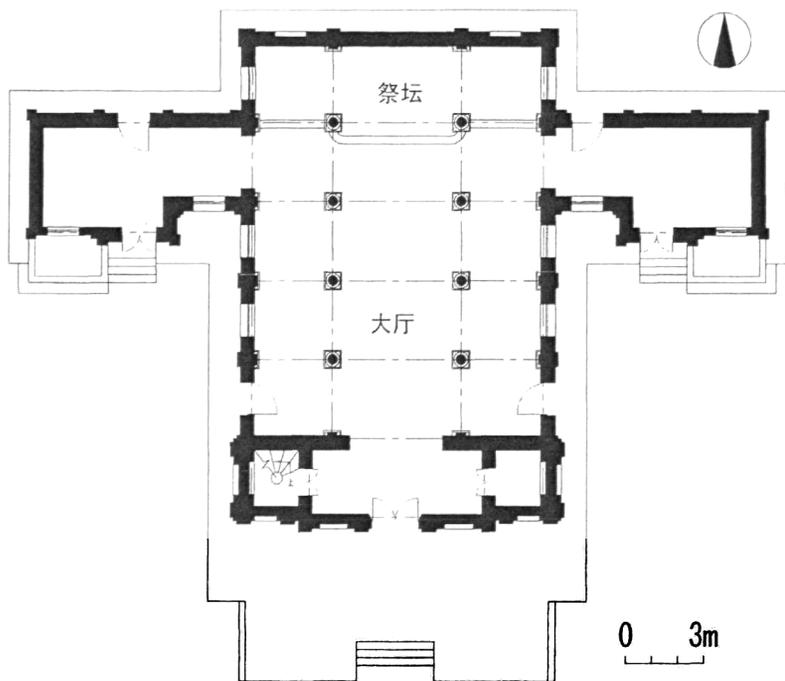


图 5-7 大同市主教座堂平面
Figure 5-7 Datong Cathedral

拉丁十字式平面是在巴西利卡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在祭坛前增建了一道横向的空间，高度和宽度

与正厅对应，于是，形成了东西长，南北短的形式。“十”字具有象征含义：在古代，十字架是一种残酷的刑具，耶稣受难于此而成为基督教的标志，另外它还代表太阳、光明的意义，符合教徒对“上帝之光”的追求。拉丁十字既能满足教堂宗教仪式的需要，又能满足教徒精神上的需求，因而成为教堂的正统平面形式。这种拉丁十字平面的教堂亦被比喻为人体，后堂象征人的大脑，它作为祭坛代表着基督圣灵的精神性空间，而教堂的其余部分，则代表着世俗世界的物质性空间。^①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这两种平面形式都不乏实例，巴西利卡式的有朔州新安庄天主堂、阳泉河底天主堂等；拉丁十字式的有大同主教座堂、太原主教座堂等。并且随着天

^① 王贵祥，东西方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图式及历史建筑空间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344~359页。

主教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教堂平面形式呈现出以下变化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面形式逐步由严肃规整的对称格局演化为灵活变通的实用性格局。如巴西利卡式平面从新安庄天主堂（图 4-6，建于 1913 年）到许堡天主堂（图 4-18，建于 1931 年）的转变，以及拉丁十字式平面从大同主教座堂（图 5-7，建于 1906 年）到朔州上坡天主堂（图 5-8，建于 1940 年）的转变。

此外，还有一些教堂使用“T 字形”平面，如临县青塘天主堂、忻州地黄梁天主堂等，一些教堂在拉丁十字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组侧翼，如汾阳市主教座堂等。但无论采用哪种平面型制，山西地区的各个教堂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平面特点。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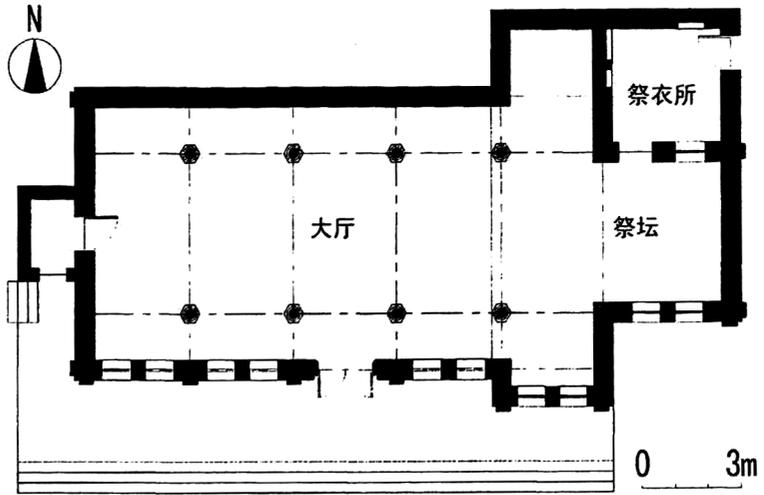


图 5-8 上坡村教堂平面
Figure 5-8 The Flat of Church

教堂在形成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施工者在建造过程中的大胆尝试，简单的教堂平面不断演化出丰富的空间变化。

5.3.4 内部空间

教堂是教徒集会的场所，是使他们心灵得到慰藉、与上天交流思想的地方，建筑场所本身需要营造出神秘、安宁、引人敬畏的信仰空间，体现礼拜精神的庄严和力量。这是宗教赋予教堂的职能，也是中西方教堂都要表现的精神。在山西天主教堂中，大量西方文化渗透到教堂内部造型空间中，体现在不同的建筑部位，所以山西天主教堂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内涵。但不同的文化对于宗教意义有不同的领悟，而不同的结构体系也限制了空间内容的表现。

西方教堂的内部空间利用光和阴影，创造出神秘空间气氛，自身的结构又使得教堂的中厅高而直，狭长而封闭，与世隔绝，在教堂中



图 5-9 临县青塘天主教堂内部
Figure 5-9 Interior of Qintang Church

人们感受到压抑、忧郁，束缚，暖融融的阳光滤过窗格，洒入教堂的空间，才能些许冲淡幽怨的阴影。山西天主教堂保留了西方教堂内部空间的模式，三廊式的大厅通过摇曳的烛光导向中心祭坛，突出其重要地位。尽管山西教堂与西方教堂有一致的界定空间，但是，山西教堂的结构没有使用西方的飞券支撑技术，建筑高度上有所限制，此外，柱间距多数使用了 4.5 米左右的开间，所以表现在内部（图 5-9）的高宽比例更趋近于人性化，简单的柱式带有地方化的特点，底层空间连续开窗，内部装饰带有传统精神，所有这些蕴含着中式的情节，方正平和的建筑空间减淡了天主教堂浓重的宗教氛围。山西天主教堂的空间处理手法也与一定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在战乱不安的年代，人们只能追求内心的安宁，而这种感觉寄予在教堂的空间上，多少能让人获得暂时的平静。

5.3.5 细部处理

5.3.5.1 柱

柱，作为承重传力构件，兼具美观装饰作用。山西教堂的柱子按形式可分为圆柱、方柱、束柱（图 5-10），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形柱式的一些做法。

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础三部分。柱头部分借鉴了科林斯、多立克等西方形柱式的做法，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简单的几何形体组合，柱头上没有图案。如大同市主教座堂的柱子（图 5-11-1）。二是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而且柱头上刻有浮雕。如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的柱子（图 5-11-2）。三是复杂形体。如太原市主教座堂的壁柱柱头（图 5-11-3）。柱身部分以木柱和砖柱为多，一般周身圆润，不加雕刻。还有个别教堂在砖柱外包木材，如新安庄天主堂。柱础（图 5-12）部分大多简单，由几层厚薄相间的线脚构成。柱子底部有基座（图 5-12），造型方正，有的刻图案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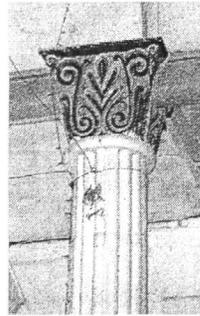


图 5-10 束柱
Figure5-10 Col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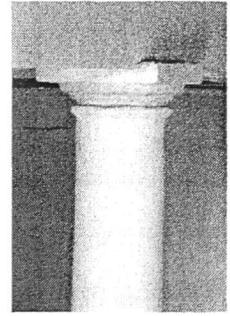


图 5-11-1 柱头一
Figure5-11-1Ca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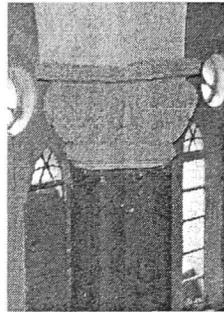


图 5-11-2 柱头二
Figure5-11-2Ca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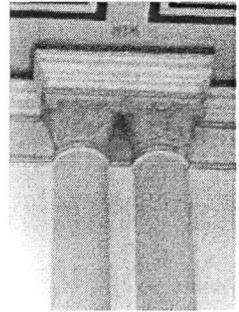


图 5-11-3 柱头三
Figure5-11-3Ca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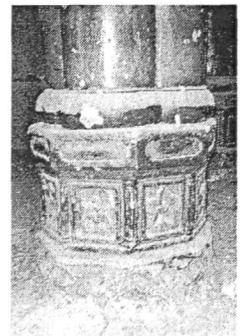


图 5-12 柱础和基座
Figure5-12 Plinth

5.3.5.2 门窗

教堂的门窗大量采用拱券形式，这种从西方建筑中引入的形式在山西当地也有类似的技术手法，所以，工匠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拱券的做法，并且十分熟练的应用到各地教堂。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拱券种类有半圆券、弧形券、双圆心尖券等。

拱券式的教堂大门，配以风格不同的装饰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利用哥特式风格逐层深入的券柱（图 5-13-1），即透视门，突出大门的地位；一种是大门上置三角装饰墙（图 5-13-2），这两种处理手法用于规模较大的教堂或教堂正立面的入口；一般的教堂大门虽然形式简单，但配有线条装饰，仍然很别致。

窗户形式除普通单窗外，还有多檐窗（图 5-14-1）、组合窗（图 5-14-2）和玫瑰圆窗（图 5-14-3）。在忻州武家庄天主堂有一种单窗，具有多重窗檐且色彩鲜艳，与透视窗有异曲同工之妙。组合窗由二个联排券窗顶着一个玫瑰圆窗组成。玫瑰圆窗经过简化变异，演绎出多样形式，富有地方特点。形式较简单的半圆券或尖券窗重点表现窗棂花样（图 5-14-4），有菱格、井字格等传统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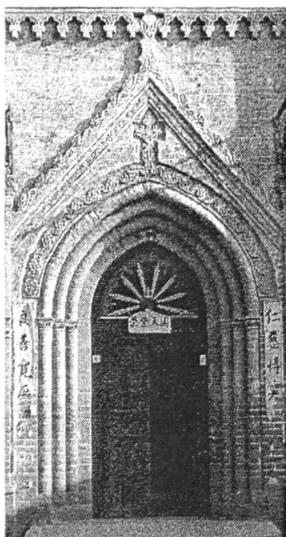


图 5-13-1 入口大门一
Figure5-13-1 Ent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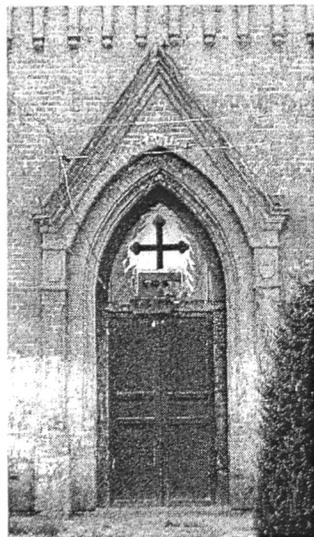


图 5-13-2 入口大门二
Figure5-13-2 Ent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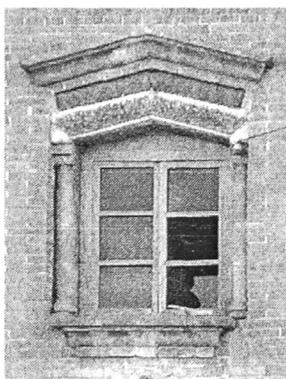


图 5-14-1 多檐窗
Figure5-14-1 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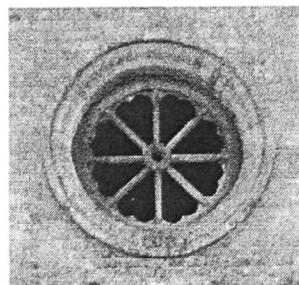


图 5-14-3 玫瑰圆窗
Figure5-14-3 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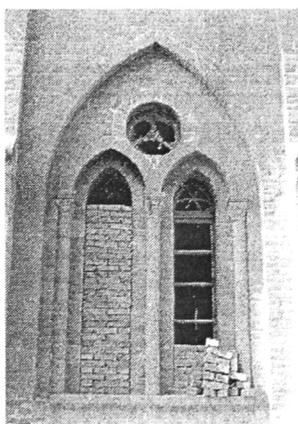


图 5-14-2 组合窗
Figure5-14-2 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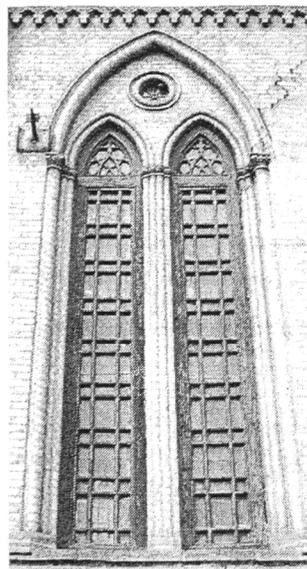


图 5-14-4 窗棂
Figure5-14-4 Window

5.3.5.3 顶棚

教堂的顶棚有两种形式：平顶和十字拱顶。平顶天花上一般使用浅浮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方式做装饰，如忻州武家庄天主堂（图 5-17）。十字拱顶就是将十字拱的结构直接裸露出来，在形成的十字上和拱与拱的连接处饰以色彩，产生韵律的美感。



图 5-17 中厅天花

Figure5-17 Ceiling of Nave

还有其它一些细部处理也能反映地方的传统特色和技术与西式建筑风格的结合。如建筑内部的空气流通，使用传统的老虎窗（图 5-18）和通气窗孔（图 5-19），建筑墙体的通气窗孔设计巧妙，与雕刻的花形或象形纹饰自然的结合在一起。此外，屋面的排水口采用了传统的形式。



图 5-18 老虎窗

Figure5-18 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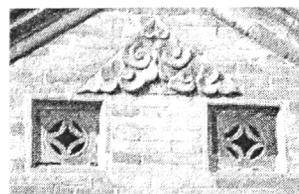


图 5-19 通气孔

Figure5-19 Ventilator

5.3.5.4 装饰

山西教堂的装饰图案丰富多样，有中式传统图案、西式的纹样，但最能表现中西融合特点的就是工匠借助地方传统纹样，并结合反映天主教义的拉丁花押字母，组合成具有明显识别性的宗教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交织在一起，产生特殊的装饰效果。

传统中式纹样主要是几何、自然图案，有花瓣、万字、宝顶等图案还有水浪纹、云形纹等纹式（图 5-20-1）。西式的卷草纹应用较多，但有的经过变形处理，与中式牡丹石榴纹相似。

拉丁花押字母是西方拉丁字母组合成的图样，有很强的宗教意义，在山西教堂中，有的直接



图 5-20-1 中式装饰纹样

Figure5-20-1

Decoration of The Chinese St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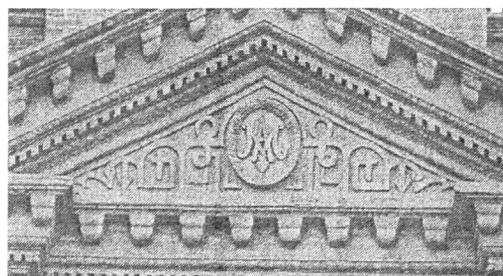


图 5-20-2 西式装饰纹样

Figure5-20-2

Decoration of The Western Style

照搬过来（图 5-20-2），有的则结合中式纹样构图，出现新的构图原则。

在教堂的装饰中，西方教堂从内而外都极大的表现了实体形态艺术，雕像和绘画艺术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有时无法肯定建筑与雕塑绘画的所属关系。而山西教堂建筑没有繁多的雕像绘画，建筑外立面大多采用浮雕的装饰手段，注重表现的是自然与宗教的关系。室内装饰使用壁画、彩漆或配以浮雕共同表现，有的把实用物件与雕刻结合在一起，十分巧妙。山西天主教堂的装饰没有一定的规范，有的教堂在立面上过多的堆砌装饰图案，失掉了整体的构图效果；而一些小教堂风格简洁，恰当的装饰使教堂更具魅力。

5.4 小结

本章从宗教含义、必备要素、基本特点三个方面总结了山西天主教堂的特点，概括出其“三要素”，并通过与西方的教堂原型的比较，可以看出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借鉴、消化、吸收了西方传统教堂特征要素，形成自身独特的建筑特色。从建筑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形成山西教堂的特征有以下四点原因：

其一，审美观念的差别。中国传统建筑讲究虚实的空间布局，表现封闭、向心、围合，建筑对自然本着尊重、适应、服从的态度；而西方建筑重视实体形的处理，表现开放、扩张。两种相对的观念相遇时，必然产生对抗和矛盾。山西教堂在形成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的平衡两者的关系，而这两种观念也不断的相互了解、相互适应。

其二，对建筑认识的差别。在中国人看来，建筑除实用外，还是表现尊卑等级的工具，道德制度的体现。而西方建筑作为人类智慧和力量的体现，是人类最高技艺的代表。山西天主教堂一方面要体现高大神圣的地位，一方面又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其中庸，形成了可以让当地人接受的造型。

其三，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差别。西方的教堂使用几多变化的拱券技术结构，以石材为主要建造原料，而中国建筑以木构为主体结构，配以砖材。山西教堂结合了两者的，形成了独特的中西结合的结构形式。

最后，设计施工人员专业程度的差别。西方建筑都是由博学多才的专业建筑师设计督建，而且有较为科学完善的建造体系；中国建筑是由工匠建造施工，一般是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没有系统的建筑理论指导。地方工匠建造山西教堂时靠神父讲解，自己摸索，不免受理论和认识的约束，而使建造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教堂建筑。

综上所述，山西天主教堂中西融合的特点，是中西方建筑相互碰撞融合中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教堂形式。

第六章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营造理念和美学、文化特征

1840~1949年是山西天主教堂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教堂大多采用欧洲传统教堂形式。然而不同于近代开埠城市，内陆地区的外来建筑更多的受到当地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制约，并经由本地工匠的理解，实现其移植和落户的过程。本章从山西教堂的营造做法入手，分析外来的教堂如何在传统观念的诠释下，运用本地的建造技术，实现西式的建筑造型。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植根于本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特色，以为当代建筑追求本土化的创作提供参考。

6.1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营造理念——以中式手法营造西式外形

在帝国主义势力横行的山西近代，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审美观念和思乡情结，教堂的建筑风格基本上都采用欧洲式^①。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大多是自己凭印象绘制并监工完成的，甚至还直接从国外拿来旧图纸进行仿造^②。但要把教堂建造起来还得依靠当地的建筑工匠，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工匠把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许多建造方法和经验用到西式教堂的建造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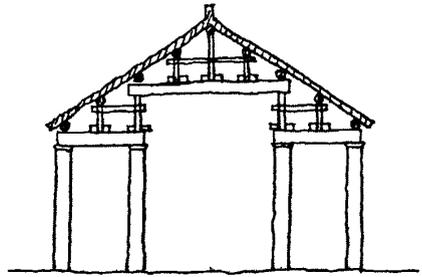


图 6-1 结构分析图

Figure6-1

The Map of The Construction

6.1.1 中式结构理念在承重结构上的变通

北境教堂的承重结构大部分是以中国传统的“抬梁式”木结构体系为原型的，但作了以下改进：

一，“抬梁式”结构的变通。传统欧式教堂的大厅空间一般分为中厅和两边的侧廊三部分，中厅空间高于两边侧廊。在很多教堂中，为了取得这样的空间效果，运用了两根瓜柱，架在侧廊的梁头上，从而将中厅部分的主梁抬高，使其高于侧廊的主梁(图 6-1)。与传统做法相比，就是将主梁分成三段，把中间的那一段抬高。不难发现，其实这种变

① J.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 1897年, 第91页。

② 杨高林, 中国近代建筑复古之初探, 华中建筑, 1987年, 第2期。

通又借鉴了传统的“穿斗式”做法。

二，用砖柱取代木柱。我国在明末木材便开始短缺，在近代，国家战火弥漫，大木料更是匮乏。因此，便出现了砖柱代替木柱的做法。同时国人特有的“亲木情结”，在某些教堂柱子的装饰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如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在砖柱的四个面上，包了四瓣接近于半圆的木料，并按照中国的传统做法，对木料做了卷杀处理，使其成为梭柱（图 6-2），刷上漆后，流光异彩，与教堂所要求的宗教气氛和谐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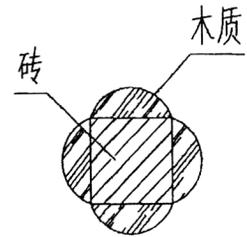


图 6-2 柱截面
Figure6-2 Column

三，柱子与墙体的交接处理。中国传统的结构观念，讲究“墙倒屋不塌”，反映在建筑外观上，便是“柱子崇拜”。并由此产生了很多墙体处理手法，诸如此例（图 6-3），将木质柱子裸露出一部分，以强调其结构功能。这种观念反映在教堂中便是壁柱的应用：在砖柱与墙体的交接处，不论室内还是室外都做了壁柱（图 4-6），以呼应大厅中的两列承重柱，从而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构观念，具有浓厚的中国味道。

6.1.2 中式装饰理念在非承重结构上的应用

中式装饰理念主要反映在以下三点：

一，大厅内装饰性的连续券和穹隆顶。在传统的欧洲教堂中，拱券和穹隆顶都是用石块砌筑的。但是传到中国后，这种石块砌筑的拱券和穹隆顶却几乎绝迹了。因为客观条件上，中国并不盛产石材，工匠们对于石材的加工和使用方法相当陌生，即便是砖结构技术也未能成熟掌握^①。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情况在很多教堂中都得到体现，如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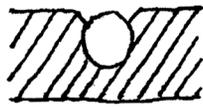


图 6-3 木柱砖墙
Figure6-3
The W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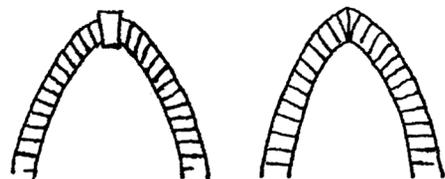


图 6-5 中欧式拱券对比
Figure6-5 The Comparison of The Arch



图 6-4 木结构拱券
Figure6-4 The Woo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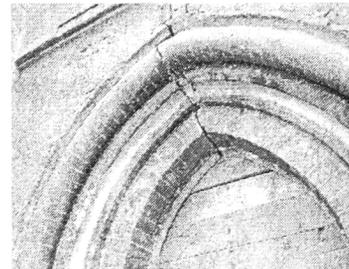


图 6-6 开裂的拱券
Figure6-6 The Broken Arch

庄天主堂，大厅中的连续券和穹隆顶属于纯装饰性构件，仅有造型要求，并不需要承重，

① 侯幼彬，李婉贞，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因此本地工匠们便运用中国传统的木装修做法来完成。即先用弧形或直线形的木条装钉出拱券和穹隆顶的框架，然后在木质框架上做面层，并刷涂料（图 6-4），这样就满足了教堂的造型需求。

二，外墙上的券洞。山西教堂的门窗洞口大多使用拱券技术，外观上与欧洲的非常相似，但砌筑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图 6-5）。欧洲的拱券在顶端往往会有一块拱心石，其余的砌块对称的砌筑在拱心石两侧；而山西大部分教堂的拱券却不存在拱心石，砌块左右完全对称。当然，这种做法是落后于欧洲的，拱券容易从顶端开裂（图 6-6）。在我国，地面建筑普遍先入为主的采用土木结构，导致砖结构的运用长期局限于地下墓室，并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砖拱与冢墓的联系，更使它难以用于宫室，从而大大限制了中国砖构的发展^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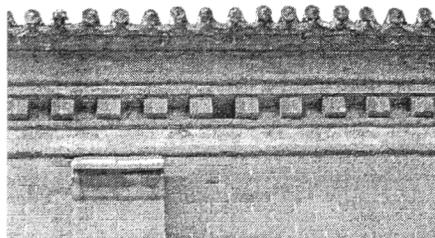


图 6-7 椽头状砖饰
Figure 6-7 The Brick

三，屋檐的仿木构件砖饰。山西大部分教堂的屋檐没有出挑，所以中国传统建筑的屋檐之美无法直接表现，但是很多教堂在做屋檐的细部处理时，却用砖块做了一些椽头样式、或者是斗拱样式之类的装饰（图 5-3-2, 6-7）。这既美化了教堂，又传达出了浓厚的中式审美趣味，验证了中国传统观念确实渗透到了教堂的方方面面。

* 砖的型号

在很多教堂中会同时使用几种不同型号的砖，如 280X140X70、280X140X50 等，分别用于建筑的不同部位，如墙身、勒脚等处。据当地一些老者介绍，解放前各个砖窑出产的砖型号是不一样的，无统一标准。

6.1.3 小结

山西天主教堂是中国近代建筑风格上中西交融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建筑营造做法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实风格上的中西交融只是现象，而我们国人用传统的观念去解读、并用自身所擅长的构造手法去营造西式建筑，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而对于历史性建筑的解读过程，又验证了一句名言“建筑是石头的史书”。

^① 侯幼彬，李婉贞，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6.2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美学特征

6.2.1 外来的宗教与传统的形式相结合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山西近代天主教堂的外观及室内都非常朴实，很少装饰或几乎没有装饰。虽然在建筑规模、建筑装饰和施工技术等方面，山西近代天主教堂与欧洲的教堂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仅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建筑，其中还是不乏成功的例子。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所表现出的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统一的建筑形式美：

教堂通常运用以下两种手法来取得建筑形式上的统一。第一、通过建筑次要部位对主要部位的从属关系。第二、通过建筑细部，如门窗、装饰构件等的形状的协调。

(2) 均衡的构图原则：

取得均衡构图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称。教堂作为西方最重要的古典建筑类型，充分体现这一原则。多数教堂的立面构图是左右完全对称。

(3) 韵律感的建筑构图：

在教堂中，经常出现如建筑的支柱、门窗等元素的重复，充分体现由建筑构图产生的韵律感。

(4) 比例和尺度：

拥有良好的比例和尺度，是衡量建筑形式美的不可忽视的标准。山西天主教堂的设计在这方面比较成功。

6.2.2 本土环境与宗教的精神追求相结合

教堂作为一种外来建筑形式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势必会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从主观来看，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为非作歹、任意侵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激起大众的强烈公愤，致使教堂成了人民反洋教起义的革命对象。为了使教堂逃避这种灾难、迎合中国百姓的心理，外国传教士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运用到了教堂之中。从客观来看，由于有的教堂建造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他们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注入教堂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出一些好的作品，如大同县许堡天主堂、朔州上坡天主堂等。

6.2.3 简朴的形态与优美的比例相结合

宗教在教徒心中的位置是神圣而崇高的，尤其是其对所信奉的“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任何其他物体都不能取代的。教堂作为教徒的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他们超越现实世界、与上帝对话的地方，在他们心中的位置也是崇高的。因为教堂主观上需要有标志性和号召性以吸引信徒，客观上又要能配合教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怀有的虔诚和崇敬的心情，所以北境教区一些教堂选址在较高的山坡上，如阪寺山圣母堂（图 3-2）、左云八台天主堂（图 4-8）等，这样的设置更加衬托出教堂的肃穆与崇高。

6.3 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历史文化特征

6.3.1 我国明末时期“西学东渐”的见证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到我国传教，山西是外国传教士到达的内陆地区。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从客观来看，也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天主教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6.3.2 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见证

鸦片战争后教堂建筑在我国的出现，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而到来的。在西方的教堂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产生碰撞和交流的初期，中国是被动的一方，然而从客观的结果来看，这些教堂建筑给中国的建造者带来了新的设计思路，为我国的建筑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类型和新形式。北境教堂融合了西方教堂和中国传统建筑两方面的特征，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的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也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体现，是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6.3.3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不仅重申了要将以前在反洋教起义和教案中被占领的教堂还给外国教会，而且还

允许法国传教士随意地在中国各地建堂传教。于是，各国传教士纷纷要求偿还教堂，一时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教士以还堂的名义霸占田宅的事件。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蜂拥而入地来到中国。这一系列事实表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过程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异域文化的大量拥入，给中国文化带来更多新的元素，客观上也使当地的建筑形式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不乏优秀的建筑作品。

结 语

本文在研究了山西北境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现存的大部分实例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堂的历史文化背景、分布特点以及各阶段的风格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近代天主教堂的发展变化规律,随后又通过对大量实例的具体论证,概括出北境教堂的共同特征。

天主教堂在由欧洲传入山西的过程中,其进攻势头已被弱化,不能不对山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所妥协与让步。当地居民的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特别是地方工匠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加上建筑材料的地方性因素,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延续性使得传统建筑的布局、空间组织和材料选择等重要特征在教堂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记。体现在北境教堂上,就是其“本土化”特征。从主观上讲,北境教堂与当地的传统建筑相遇于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矛盾氛围中;但从客观上讲,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就不可避免的要相互影响,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也自然会带有自己原有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式,传统习惯很难改变。就建筑来讲,西式教堂并非被全盘吸收,而是用传统的观念被重新解读了,因此山西天主教建筑具有风格上的非典型性。

因此可以说,山西天主教堂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异质性与排他性中所完成的平衡与交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它的价值和魅力。

从历史角度来讲,近代是西方殖民扩张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时期。山西天主教堂所表现出的中西交融的典型特征,说明中西两种不同源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的文化,能够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共生趋势,虽然这一结合的过程曲折,带有冲突甚至血腥的记忆,但是中西融合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中国不再封闭自恋,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接受、营养自身的需求。近代,随着教堂进入山西,在地方民宅、商铺和一些公共建筑上渐渐出现了西方建筑形式,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教堂建筑拉开了山西建筑中西交流的序幕。

从艺术角度来讲,单一的直线形艺术难以发展出新颖的艺术形态,只有不同的多种艺术交流与融合才能注入有生命的新元素。山西天主教堂正是中西艺术交流的成果。它带来了西方经典的古代建筑文化——成熟稳重的罗马风建筑、高大挺拔的哥特风格、奇特夸张的巴洛克艺术,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使地方工匠也因异域风格的冲击而焕发了新的创作意识,把地方建筑的优秀手法塑造在西方建筑艺术中,诠释

出新的建筑形态，虽然这种形态发展不尽成熟、不够完善，但它却是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为中国建筑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建造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出现新的建筑形式。千年的中国建筑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建筑形式，桎梏于木结构的建造技术中，尽管不断的改进发展，但很少有实质性的突破。而西方教堂建筑带来的教堂形式丰富多样。山西教堂是展示西方建造技术的窗口，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接纳下来，而是根据自身的技术特点有目的的吸收了相似的西方结构技术，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教堂。

中西融合的山西近代天主教堂所具有的这些价值和魅力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山西教堂不仅可以梳理它的发展过程，了解它的整体特点，还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被遗忘的建筑理念，为迷失传统的现代建筑提供历史延续，为塑造出表现地方风貌的新建筑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李金华,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年.
2. 刘宏刚, 赵墉, 张鼎新, 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 大同, 内部资料, 2006年.
3. 马良等, 《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 教友生活编辑部, 1997年.
4. 段春生, 山西开教宗徒高一志神父事略, 2005年.
5. 王守恩, 刘安荣, 近代山西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排拒与皈依——以刘大鹏、席胜魔为例, 宗教学研究, 2006年, 第2期.
6.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7. 王守恩, 刘安荣, 17~1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 晋阳学刊, 2003年, 第3期.
8. 赵政民,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Z】, 太原,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2年.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末教案【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年.
10. 赖德烈,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M, 纽约, 1929年.
11. 顾卫民, 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5月, 第12卷(第3期).
12.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M], 台南, 主徒会出版, 1982年.
13. 刚恒毅,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M], 台南, 主徒会出版, 1982年.
14. 顾卫民, 刚恒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世界宗教研究, 1996年, 第4期.
15. 韩铎民(P.Lodoricia.Hererich), 朔县教区简史, 李树洙(译), 内部资料, 1963年.
16. 郭崇禧, 山西天主教简述, 《山西文史资料》第57辑, 1988年.
17. 黄一农, 《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 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 1996年.
18. 霍成, 汾阳教区史, 内部资料, 1996年.
19. 天主教榆次教区沿革, 内部资料.
20. 黄一农, 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
21. 段春生, 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 内部资料, 2005年.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

23.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24.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25.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 新绛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11月.
26.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复古之初探, 华中建筑, 1987年, 第2期.
27. 乔志强主编,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史, 中华书局, 1997年.
28. 刘泽民等主编,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史(近代卷卷六),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9. 候愈荣, 天主教忻州教区历史概述, 内部资料, 1995年.
30. 乔润令, 山西民俗与山西人,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年.
31. 太原市阳曲县阪寺山圣母堂简介, 堂内展板.
32. 河底天主教简史, 内部资料.
33. 格里森(Gresnigt), 中国的建筑艺术, 董黎(译), 华中建筑, 1997年, 04期.
34. 李允稣, 《华夏意匠》,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5. 赵一舟神父, 详见月刊《见证》, 2003年1月.
36. 王贵祥, 东西方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图式及历史建筑空间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年.
37. 候幼彬, 李婉贞,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年.
38. 莫勒(A.E.Moule), The Chinese People—A Handbook on China, London, 1914年.
39. Fortunato Margiotti, Il cattolicesi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 Roma, 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 1958年.
40. Chinese Recorder, Vol.64.
41. J.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 1897年.
42. E.W.Burt, M.A., After Sixty Years, London, Garey Press.
43. Tidafi, T. Booth, D.W., Architectural simulation by modeling procedures, The creation of the Church of Saint-Eustache in Paris, Advances i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Series, v 3, 1997年.
44. Michael Rae burn, Archite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980年.
45. Calarco, A.Cammarata, G, Loddo, C., Tripodi, D., The acoustic project of St Maria

- of Savoca in the plan of recovery of the former church, *Acta Acustica (Stuttgart)*, v 89, n SUPP., May/June, 2003 年.
46. Theodossopoulos, D. Sinha, B.P., Usmani, A.S., Case study of the failure of a cross vault: Church of Holyrood Abbey,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v 9, n 3, September, 2003 年.
47. David Warkin, *A History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U.S.A, 1986 年.
48.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1998 年.

插图目录

第二章

图 2—1 山西北境教区的各式教堂——依次是临县青塘天主堂、阪寺山圣母堂（师姐李瑾提供）、太原天主堂（师姐李瑾提供）、朔州石碣峪天主堂、忻州大堡沟天主堂

图 2—2 建国前山西北境教区图

第三章

图 3—1 清初原明王府改建的教堂（师姐李瑾提供）

图 3—2 板寺山教堂建筑群（师姐李瑾提供）

图 3—3 左云八台天主堂原貌（本堂牛神父提供）

图 3—4 朔州新安庄天主堂原貌（朔州天主总堂马主教提供）

图 3—5 大同县许堡村天主堂

图 3—6 朔州上坡村天主堂

图 3—7 太原西柳林天主堂

第四章

图 4—1 大堡沟天主堂总平面测绘图（想象复原图）

图 4—2 大堡沟天主堂立面

图 4—3 大堡沟教堂平面测绘图

图 4—4 阪寺山圣母堂总平面（师姐李瑾提供）

图 4—5 阪寺山圣母堂立面（师姐李瑾提供）

图 4—6 新安庄教堂平面测绘图

图 4—7 新安庄教堂立面

图 4—8 左云八台天主堂仅存的钟楼

图 4—9 大同南郊区西榆林天主堂

图 4—10 大同市主教座堂原貌（大同市天主教会提供）

图 4—11 朔州市沙垆河天主堂

图 4—12 朔州市石碣峪天主堂

图 4—13 原平墩阳天主堂

- 图 4—14 临县青塘天主堂
- 图 4—15 汾阳杨家庄天主堂
- 图 4—16 建于 1905 年的太原主教座堂（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 图 4—17 河底天主堂组群（阳泉市天主教会提供）
- 图 4—18 大同县许堡村教堂平面测绘图
- 图 4—19—1 大同县许堡村教堂屋顶
- 图 4—19—2 大同县许堡村教堂台基
- 图 4—20 阳高县张官屯天主堂
- 图 4—21 朔州市南磨石天主堂
- 图 4—22 忻州市地黄梁天主堂
- 图 4—23 忻州市武家庄天主堂
- 图 4—24 榆次市博爱里天主堂（师姐李瑾提供）
- 图 4—25 汾阳主教座堂

第五章

- 图 5—1 西方教堂的内部——乐托达姆修道院内部（张柏《世界著名教堂》）
- 图 5—2—1 屋顶形式一——朔州市石碣峪天主堂屋顶形式
- 图 5—2—2 屋顶形式二——汾阳市主教座堂屋顶形式
- 图 5—3—1 屋顶檐口一——原平墩阳天主堂屋顶檐口
- 图 5—3—2 屋顶檐口二——忻州市武家庄天主堂屋顶檐口
- 图 5—3—3 屋顶檐口三——大同县许堡村天主堂屋顶檐口
- 图 5—4—1 外墙形式一——原平墩阳天主堂外墙形式
- 图 5—4—2 外墙形式二——汾阳市主教座堂外墙形式
- 图 5—5—1 立面顶部形式一——阳泉河底天主堂立面顶部形式
- 图 5—5—2 立面顶部形式二——汾阳市主教座堂立面顶部形式
- 图 5—6—1 西式钟楼——临县青塘天主堂主立面钟楼
- 图 5—6—2 中式钟楼——阳泉河底天主堂独立钟楼
- 图 5—7 大同市主教座堂平面测绘图
- 图 5—8 朔州市上坡村教堂平面测绘图
- 图 5—9 临县青塘天主教堂内部

- 图 5—10 束柱——朔州市石碣峪天主堂束柱
- 图 5—11—1 柱头一——大同市主教座堂柱头
- 图 5—11—2 柱头二——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柱头
- 图 5—11—3 柱头三——太原市主教座堂柱头
- 图 5—12 柱础和基座——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柱础和基座
- 图 5—13—1 入口大门一——临县青塘天主堂入口大门
- 图 5—13—2 入口大门二——朔州市石碣峪天主堂入口大门
- 图 5—14—1 多檐窗——忻州市武家庄天主堂多檐窗
- 图 5—14—2 组合窗——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组合窗
- 图 5—14—3 玫瑰圆窗——忻州市武家庄天主堂玫瑰圆窗
- 图 5—14—4 窗棂——汾阳市主教座堂窗棂
- 图 5—17 中厅天花——忻州市武家庄天主堂中厅天花
- 图 5—18 老虎窗——汾阳市主教座堂老虎窗
- 图 5—19 通气孔——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通气孔
- 图 5—20—1 中式装饰纹样——临县青塘天主堂装饰纹样
- 图 5—20—2 西式装饰纹样——阪寺山圣母堂装饰纹样（师姐李瑾提供）

第六章

- 图 6—1 结构分析图——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结构分析图
- 图 6—2 柱截面——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柱截面
- 图 6—3 木柱砖墙
- 图 6—4 木结构拱券——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室内拱券
- 图 6—5 中欧式拱券对比
- 图 6—6 开裂的拱券——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主立面拱券
- 图 6—7 椽头状砖饰——朔州市新安庄天主堂檐部砖饰

注：除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其余图片、测绘图以及手绘图均为笔者拍摄和绘制。

致 谢

在论文即将结束之际，一丝欣慰与许多感想浮上心头。回顾这近两年的论文工作，辛劳的调研与枯燥的资料查阅浸润于字里行间，化作奋笔疾书后的快感和愉悦，让我时时不能忘怀。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瑛教授，本文选题开始，导师就反复叮咛要深入调查，广泛收集资料。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论文大局的把握上，具体要点的深入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师从先生的三年，使我受益很大，先生不仅治学严谨、知识广博，而且为人和善，诲人不倦，时常提醒弟子要做好学问就要先学做人，这种言传身教的影响，必然会有益于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感谢我的师姐李瑾，给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照片和资料，并且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毫无保留的与我分享了她的一些个人见解。

感谢我的同窗王晓华，与他相处的日子让我感受到美好的情谊，同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给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

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多年来他们无尽的关怀、帮助和奉献，是我学习的动力和源泉。

感谢我的女朋友王晓艳，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感谢在调研中给予我支持的天主教会的教会人员和教徒信友，谢谢他们热情的讲解与提供的重要资料。

我还要感谢曾经帮助和关心我的所有老师、同学和朋友。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教授！

马 骥

2008年5月于太原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王瑛 马骥,《新安庄天主教堂构造分析—中式手法营造的西式外形》,华中建筑, 2008.7.